



福特汽车环保奖

影响力报告

20周年

20



2020 CONTENTS

目 录

在一起,了不起——来自“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的幕后故事	02
“福特汽车环保奖”历年获奖项目/组织现状及影响力调查	08
调查方法	10
获奖项目/组织的领域分布、地域分布、获奖方注册性质	11
历届获奖项目运行情况	14
获奖项目/组织的受益人规模和对当地的各类影响	15
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对项目/组织的影响	25
获奖方(机构/团队/个人)现状	27
人物故事	33
一辈子只守一座山——滇金丝猴守护者肖林、张志明、奚志农	33
挚爱江河源——三江源守护者杨欣、扎多、阿旺	41
传递一颗爱自然的心——赖芸、赖寒、汪永晨	49
那人那树那一生——吴向荣、郑乃员	57
寻找一片蓝色海洋——韩寒、夏嘉祥、刘永龙	62
温和地重建绿色——方应君、璇芷、周翔	71
影像,带来希望——野生动物摄影师徐健	78
我们依旧珍惜这些真实的链接——“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审张立、李瑞农	81
附录1. “福特汽车环保奖”历届发展历程	85
附录2. 评审专家名单	88



在一起,了不起

——来自“福特汽车环保奖” 组委会的幕后故事

2011年秋天,我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个小院子里第一次见到了Scott(张志鹤,时任福特中国企业传播总监)。当时正在参与公益培训的他,招呼我出来坐下后就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给我介绍“福特汽车环保奖”是怎么回事,希望我们能够提交一份关于如何重振这个项目的方案,以便考察我们是否有能力承担“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这份工作。彼时,我所在的明善道已经做过不少名动江湖(自以为)的公益评选,对接手这样一个项目感到驾轻就熟,很快提交了一份创新解决方案,结果Scott收到后却没有任何反馈,但从2012年起,我头上多了一个标签:“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负责人。八年来忙着拉车赶路,一头撞进环保公益圈,一晃到了“福特汽车环保奖”20周年,我最大的感受和收获都是这句:“在一起,了不起”。

在一起,很容易吗?



在我们接手“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工作两年后的一天,也是一个秋天, Scott 跟我说,其实你们提交的那个方案每页我都仔细看过了,我认为你们说得都挺好,但我不能马上就改革,按照你们提的方向来。因为“福特汽车环保奖”是一个有自己传统、有自己坚持方向的公益项目,我很珍视它,对它做改革和创新是必然的,但我需要你们先进来,先感受,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它要怎么走。这里的传统很多,凡事听专家老师的,任何调整都需与专家老师商量,每次评审都得专家老师之间不断沟通全部同意才能得出结果,不搞举手投票,就是起初最令我们开眼界,也有些将信将疑的传统之一。

2015年颁奖礼上,评审吕淑萍老师、张坤民老师意外地被主持人叫上台,全场掌声雷动,感谢两位评审15年如一日的服务。福特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礼祥先生为两位老师颁发“特别贡献奖”。吕淑萍老师手捧鲜花,有些激动地说:“这真是一个惊喜,我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领奖的一天,没想到这事一做就是15年,头发已经由黑变花白了,感谢福特的信任、交托。”吕老师是第一拨在福特汽车环保奖“退休”的评审,后来“曾经最年轻”的评审张立老师,跟我说想退休了,让组委会也给一个“特别贡献奖”,我说那不行,吕老师都打样了,要服务期满15年才可以。其实到2020年,已有三位评审老师“超期服役”了,但无一位评审老师真要退休,就像张立老师所说:“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委已经是我一个长久的身份了,这十几年里我做大学教授、做国际组织首代、做基金会秘书长,唯一不变就是做这个项目的评委。”这份拥有感令人动容。20年间,评审委员会已经完成过不止一次的交接棒,由老中青三代到今天的中青年两代,不经意间,完全由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成为了“福特汽车环保奖”的独特标志。我们都知道评审乱象不是今天才有,评审乱象也没有放过公益圈,所以这份一直在一起的岁月静好,容易吗?

评审委员会“一团和气”的工作方式,有时真让组委会的小伙伴着急。2017年是“福特汽车环保奖”升级做组织资助的第一年,对于“年度先锋大奖”的讨论已经从傍晚进行到10点了,还未达成共识。这时,曾操练过“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评审高天老师说,这样下去不行,要不试试“萝卜”规则?老师们都觉得当天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那就尝尝“萝卜”。结果到了晚上11点半,评审间交流有点要动“真气”,气氛弄得有点尴尬,也还未达成共识。好吧,这证明“萝卜”在这里行不通,每位老师还是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说明理由、倾听意见,终于在12点半所有老师都认为大奖应该是同一家,才在评审

表上签字走出会议室,而在这个过程中主办方代表Tina(张朗萱,2012年起至今担任福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只跟我发过两条短信:结果出来了吗?不急,让老师们达成共识。后来有评审老师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工作团队,都依依不舍,觉得评审委员会像个大家庭,很温馨美好。所以,这份在一起的前提是合作方之间的尊重,信任和权责分明,这份在一起的不易是所有人都愿意付出:多点耐心、多点努力、多点理解。



2015年“福特汽车环保奖”首次评审会议合影,前排居中者为评审吕淑萍老师,前排右一组委会负责人赵坤宁,右二福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理Tina(张朗萱)、右三评审陈键老师、右四恩派项目总监韩燕、后排均为评审,从左向右分别是:张立老师、周琪老师、徐本亮老师、李瑞农老师、胡小军老师、高天老师

我们要在一起吗？

过了热闹和让人心胸澎湃的十五周年庆典,组委会团队开始在想,“福特汽车环保奖”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做环保公益资助,拥有传承十几年并不断丰富资助清单、评估考察报告、评审鉴定信息的一家“资方”,除了自己成为“环保公益界奥斯卡”,还能给环保公益行业分享些什么?如何让自己和其他环保资助者形成合力?我们把这个想要分享资助清单的初步想法跟评审老师张立、胡小军沟通后得到热情的肯定,再跟Tina沟通时,我还特别用“老钱”比喻“福特汽车环保奖”之于环保公益,“新钱”比喻后起的国内环保资助者,说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为行业做贡献云云,结果她就一句,这是好事,我们支持开源,就是组委会要花心思了,要有成效。“福特汽车环保奖”愿意分享资助信息,那别人愿意一起吗?

环保公益业内做资助的基金会其实不多,而资助对象基本是同一批,只是每家资助的角度、形式和时间点可能不一样,有时一家组织是接待完这家资方的实地考察,又接待另外一家,给公益组织平添工作,每家资方都来一遍相似的考察评估也是

价值不大,但没有挑头说分享资助信息的人,那就还是各守其门,各自过。“福特汽车环保奖”虽然是一个企业发起的公益项目,但拥有悠长的环保资助史,反倒容易破局。2016年7月14日,我们和时任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千禾社区基金会秘书长的两位评审老师拉起一千人马在组委会办公室召开了**“环保资助者信息共享机制第一次会议”**;2016年底我们就邀请伙伴作为特别来宾在颁奖礼亮相:“今夏,我们怀着提高资助效率、推动行业发展的共同愿景,走到了一起,我们是环保公益的资助者,我们是绿色未来的投资人,期待我们共同为环境投资贡献智慧,为推动环境改善奉献力量。”当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就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合一绿学院协力,推出了国内首份《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工作领域观察报告2016》。这份报告从推出的第二年开始由四家共享机制伙伴联合资助,从此打开了环保公益领域的知识积累和分享的序章。

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自愿的共享机制,环保资助者信息共享机制在6家发起单位参与后,又迎来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一汽大众新未来基金、银杏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深圳市质兰公益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基金(SGP)7个不同背景伙伴的陆续加入。不断壮大的同行者像是对我2016年提问的绵长回音,更是证明凡是公益的,最好大家一起来做,而且公益力量无远弗届,商业上的对手也可以一起做公益。所以,如果你真要实现一个光荣的梦想,真心要分享,就不要再问“我们要在一起吗”,干就是了!



环保资助者信息共享机制首次会议合影,从右向左分别是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项目官员张卫、戴晓艳、中华环保基金会项目官员王晓鸽、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刘晓雪、合一绿学院负责人祝丽华、福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理Tina(张朗萱)、组委会负责人赵坤宁、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杨方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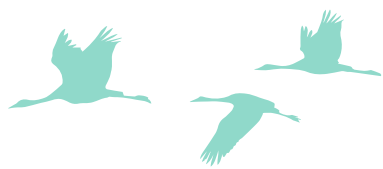
有什么了不起？



每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发布获奖名单时，社交媒体上排名第一的评论都是：又一年啊，什么怀疑在时间面前都消逝无踪了。这个现在一说起来“三最”加冕（国内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累计投入资金和惠及环保公益组织数量最多的环保公益评选），听众纷纷竖起大拇指的公益项目，其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面临质疑，包括我也有不明。

2000年落地中国之时，项目没有可供参考的对象，彼时罕有企业自己独立发起公益项目，一般都是直接捐钱到基金会的现有项目，而且跨国公司还大多选择把资金捐赠给国际组织，比如与赠与亚洲或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为什么不选择捐赠给基金会，而是要给民间做环保的人？民间环保力量是谁，靠谱吗？企业的产品还未在国内上市，提前三年就开始做公益，合适吗？福特汽车到底图什么？一时间，“福特汽车环保奖”更像是“出头鸟”，虽然前几届的颁奖礼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但人们对它的揣测从没停过。2006年，国内环保公益圈还曾以“中国环保NGO是否应该向‘福特汽车环保奖’说不？”展开大讨论，背景是有消息说西方环保NGO因福特车的燃料燃率不够环保而发起了抵制，那么中国同行是否要跟进，由此还延申到对一个观点的讨论：“一个普通公民捐助的一元钱，其价值远大于一个企业为自身公关目的而捐赠的一万元”，还有专家建议几个大的、知名的环保NGO应该带头抵制云云。这些声音相信福特汽车不会没有听到过，我做组委会负责人这八年还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福特为什么不聚焦具体环境问题来做，比如种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也好讲故事，做了这么多年对环保NGO的支持，也没觉得环境有多大改变。但福特中国好像充耳不闻，在企业经营遭遇困境时都没有停止对“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投入，奖金亦从起初的100万，调整到150万，再到近年的200万。**今天，对福特中国当年的勇敢出发，敢为天下先，所有人都会说了不起。对，一干就是20年，所有人都说没想到，这样的坚持难道不了不起吗？做评选给人发钱不难吧，为什么要坚持走一条少人走又冷寂的路？这事看起来几十年都未必能做成，这个企业有点不一样。**

近年来“福特汽车环保奖”的第二大类获奖群体是污染防治类NGO。这其中亦有获奖组织在向媒体举报汽车企业供应链存在环境问题时一并提及福特中国，之后继续申请，又再次获奖。作为亲历者，我知道评审委员会曾经也讨论过是否需要征询主



办方的意见,而后又坚持按照评审原则,给这家表现优秀的污染防治类NGO获奖机会,而主办方一如既往,不参与评审、不干预评审结果,接过获奖名单,向所有环保伙伴表示祝贺。**企业做公益可不是花钱买名声那么简单,我觉得评审委员会坚持原则,公正评审值得点赞,但主办方的高姿态更值得五星好评。**

作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的负责人,我有幸与福特中国的高管一起接受媒体的采访,对于这个项目做了什么、有什么成效我一般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埋在我自己心里。我想问福特中国的高管,他们到底怎么看待“福特汽车环保奖”?没想到在去年启动仪式上,我还没问,就听到了一个让我怦然心动又觉得唯一合理的答案。有位记者向主办方代表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提问:“我们都知道福特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投入,不仅是每年公布的奖金,还包括运营和传播的资金投入,可能这部分投入远超奖金数额。明年就是20周年了,请问福特中国方面会做整体投入的梳理吗?大家一直都很好奇。”安宁总看了我一眼,稍微停顿一下,说:“感谢关注即将到来的20周年,据我所知我们会做系统的梳理,来看清楚实际取得的成效,并重点规划未来。但我们不会做整体投入数据的统计和披露,因为福特中国认为公益不能简单通过数字品评,而且我们做‘福特汽车环保奖’不是基于营销和公关,而是公司使命使然。”我想安宁总看我一眼的原因是,这个问题我们事先没沟通过,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先回答了,之后需要我再做补充。我对这个回答只有敬服,没有补充。**这是使命使然的一件事,那么短时间的回报就不那么重要,那么只要这个“冷板凳”还没坐热,民间环保力量还不够强大,就继续支持和陪伴,那么日子再困难,也要坚守!原来支持民间环保力量是福特中国的使命之一,有这样使命的企业有几家?了不起!**

当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进入中国指引方向的特别顾问、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教授曾在十周年撰文《**中国环境保护的脊梁**》中说:“感谢‘福特汽车环保奖’为这些环境英雄提供很多的帮助,从资金支持到精神鼓励,尤其是后者,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给他们创造了更多的空间。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推进环境保护事业,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艰巨的事业中来”。2019年,我代表组委会登门拜访曲老,他说:“关注民间环保就是扎根接地气,‘福特汽车环保奖’一直做得很务实,这很好,能够坚持20年,我也没想到,相信它已经开花结果,扎根中国了,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福特汽车环保奖”与“脊梁”同行的20年,一起经历了理想进发、现实考验、曲折低回、奋力向前,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民间环保力量成长发展的历程,青山绿水如有意,应为这样一群人守望、喝彩!**

“福特汽车环保奖” 历年获奖项目/组织现状 及影响力调查

“福特汽车环保奖”在中国的二十年，是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得到政府重视、民间环保力量逐渐成长、公众环境意识逐渐提升的二十年。

环保公益是中国公益行业中比较独特的部分。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几乎伴随着我国环保公益组织的诞生而开始¹。一般认为最早的中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是1991年成立的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和1994年成立的自然之友。此后在21世纪，民间环保公益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的作用曾被概括为²：

有效推动环境知识的教育与宣传；推动和促进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实施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具体项目；推动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推广，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 and 消费者环境责任担当等；进行政策研究并为决策建言献策；推动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并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等。

在发挥作用的同时，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的数量仍然有限，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共有登记在册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约六千余个，而最新的环保公益行业性调研尚追溯到《2015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年度发展报告》，该调研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共2768家，总人数22.4万人。这与全国31.5万民间组织，总人数300多万人相比，处在中下等发展水平。”

事实上，很多环保公益组织在基层的不同领域开展着工作，却不为公众所知。虽然互联网平台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很多环保组织最终的环境绩效改善可控性不高，工作方法不易简单颗粒化到能向公众筹款，在近年的腾讯99公益

① 《公众参与 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蔡定剑主编，法律出版社2009。第四篇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最广阔的战场。
②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5)》的总报告“中国：发育成长中的环境公民社会”。
③ 根据公开数据，腾讯99公益日活动中，环保及动物保护类筹款额在2017年占6.7%，在2018年仅为4.2%。

日中,环保类项目筹款的比重是比较低的³。行业仍面临资金和人员,管理和品牌等诸多挑战。

“福特汽车环保奖”一直关注行业发展和环保公益组织的需求,并及时调整资助策略和方向。奖项二十年的发展一般分成三个阶段:



“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发展是中国民间环保公益的一面镜子,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环保公益,我们从二十年资助过的443个优秀环保项目或组织入手,了解他们的发展状况,他们在生态环境改善、社区参与和发展、政策倡导和企业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不同资助对他们的影响。这既是“福特汽车环保奖”二十年的回顾总结,也是未来继续支持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参考借鉴。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调查能为对环保公益感兴趣的个人或机构提供一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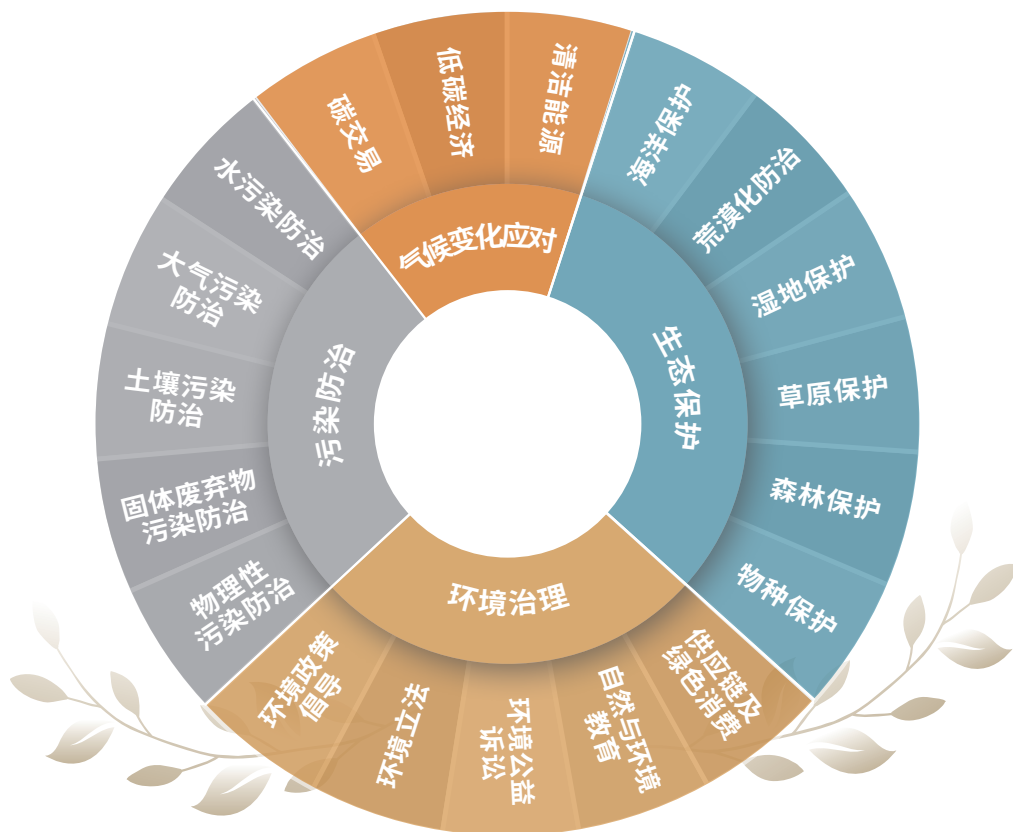
调查方法

● **调查对象：**2000年至2019年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机构/团队/个人，共计443个获奖项目/组织⁴。其中2000-2016年以项目资助为主(410个获奖项目)，2017-2019年面向环保公益组织开展非限定性资助(33家获奖组织)。由于存在同一机构/团队/个人在不同发展阶段多次获奖的情况，因此历年共有355个获奖方(机构/团队/个人)。

我们向上述获奖方发送了现状调查问卷，由于联系方式缺失、个别获奖者去世⁵等原因，最终向243个获奖方发出问卷，169个获奖方填写了问卷，覆盖获奖项目174个。其中25家2017-2019年的获奖组织(共33家)回答了问卷。

● **调查内容：**历年获奖项目/组织、获奖方的基本信息分析；问卷分析，包括历届获奖项目的运行情况，获奖项目/组织的受益人规模以及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社区、政府和企业的影响，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对于项目和组织的影响，以及获奖方的现状等。

● **领域分类：**环保公益有着众多细分领域，每个领域的政策环境、面临的挑战、环保公益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都有所不同。部分领域的差异比较大。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领域环保公益组织的不同，“福特汽车环保奖”结合评审专家意见，划分了行业细分领域。本报告遵循此分类。



⁴ 本报告后续提及的“获奖项目/组织均指2000-2016年的获奖项目和2017-2019年的获奖组织。

⁵ 已去世的获奖者包括吴登明老师、张志新老师、贾晓淳老师、格桑泽仁(刘赞)老师，向他们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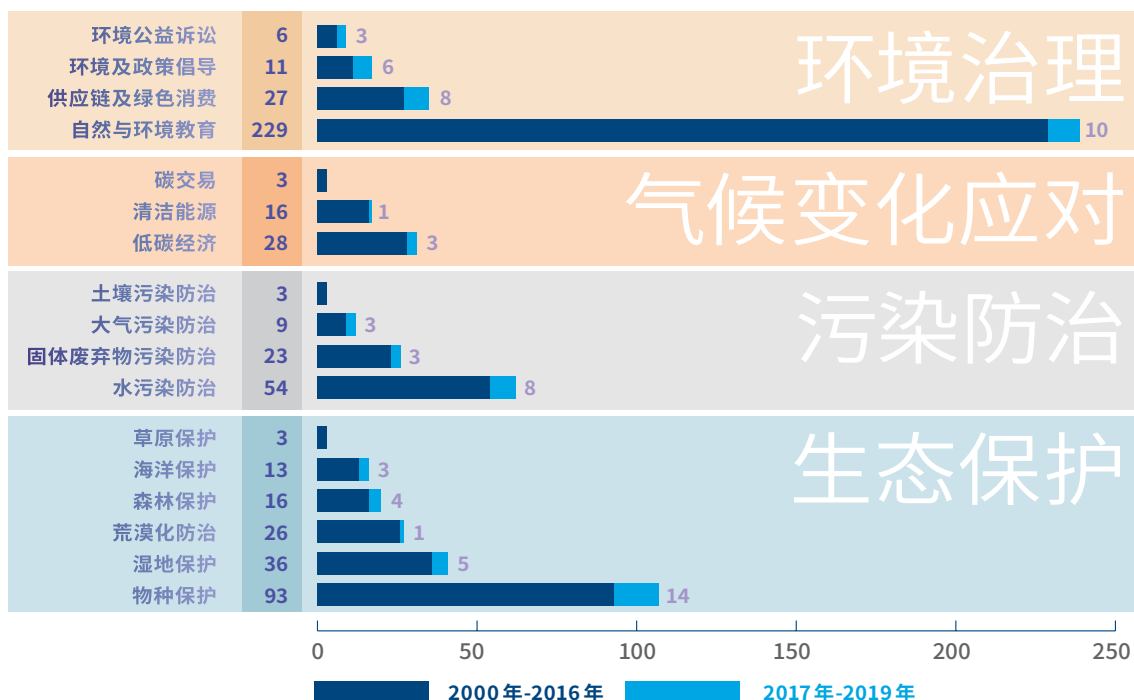
获奖项目/组织的领域分布、地域分布、获奖方性质

获奖项目/组织的领域分布

“福特汽车环保奖”对环保公益行业的支持是不分议题的,主要是为了给予有需要的民间环保力量以支持。对历年 443 个获奖项目/组织的领域进行分析(可涉及多个领域)进行统计,一定程度代表了从事各细分领域的环保公益组织的比重:

- 总体而言, 2/3 的获奖项目/组织涉及“**自然与环境教育**”领域; 近一半获奖项目/组织从事“**生态保护**”, 其中的一半为“**物种保护**”; 近 1/4 获奖项目/组织从事“**污染防治**”, 其中六成为“**水污染防治**”。
- 涉及“**环境治理**”的获奖项目/组织最多(共有 300 个), 主要原因是共有 239 个获奖项目/组织采用“**自然与环境教育**”的工作方法。此外,“**供应链与绿色消费议题**”在 2017 年以后出现的频率有所上升。
- 其次是涉及“**生态保护**”的获奖项目/组织共有 214 个, 其中细分领域“**物种保护**”相关的项目/组织获奖最多(共有 107 个)。
- “**污染防治**”也是环保公益的重要工作, 涉及该领域的获奖项目/组织共有 103 个, 其中“**水污染防治**”相关的项目/组织获奖数量最多, 为 62 个。
- 涉及“**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获奖项目/组织相对较少(共有 51 个), 其中“**清洁能源**”的项目主要分布在 2012 年之前, 以沼气的综合利用为主。

图 1. 历年获奖项目/组织的领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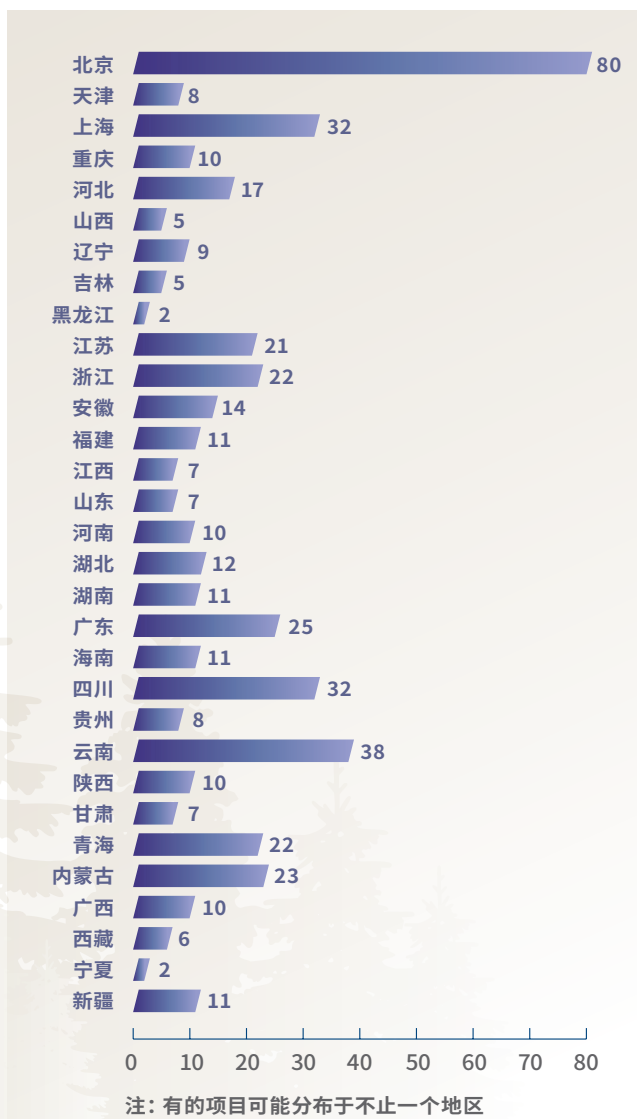


获奖项目/组织的地域分布

对获奖项目所在地、近三年获奖组织的核心业务所在地进行统计,可以看到:

- **443**个项目地/组织核心业务所在地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主要分布在北京、云南、四川、上海、云南、广东、内蒙古、青海、江苏、浙江等地。

图2. 获奖项目/组织的地域分布



获奖方注册性质分布

“福特汽车环保奖”以支持民间环保力量为宗旨,一直向不同类型的环保公益主体开放怀抱。环保公益行业在20年中也经历了个人单打独斗到组织化发展的阶段,环保机构注册也逐渐有了更大的空间。因此“福特汽车环保奖”也逐渐向支持专业组织倾斜,2017-2019年面向已注册组织开展非限定性资助。从2000-2016年的获奖方的性质可以看到:

● 历年来，**40%**左右的获奖方为民政注册的环保公益机构(包含社会团体、民非/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三类)，**29%**为个人获奖，**9%**为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包括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学校等，**6%**为学生社团/团队，主要来自**2001-2006**年设置的青少年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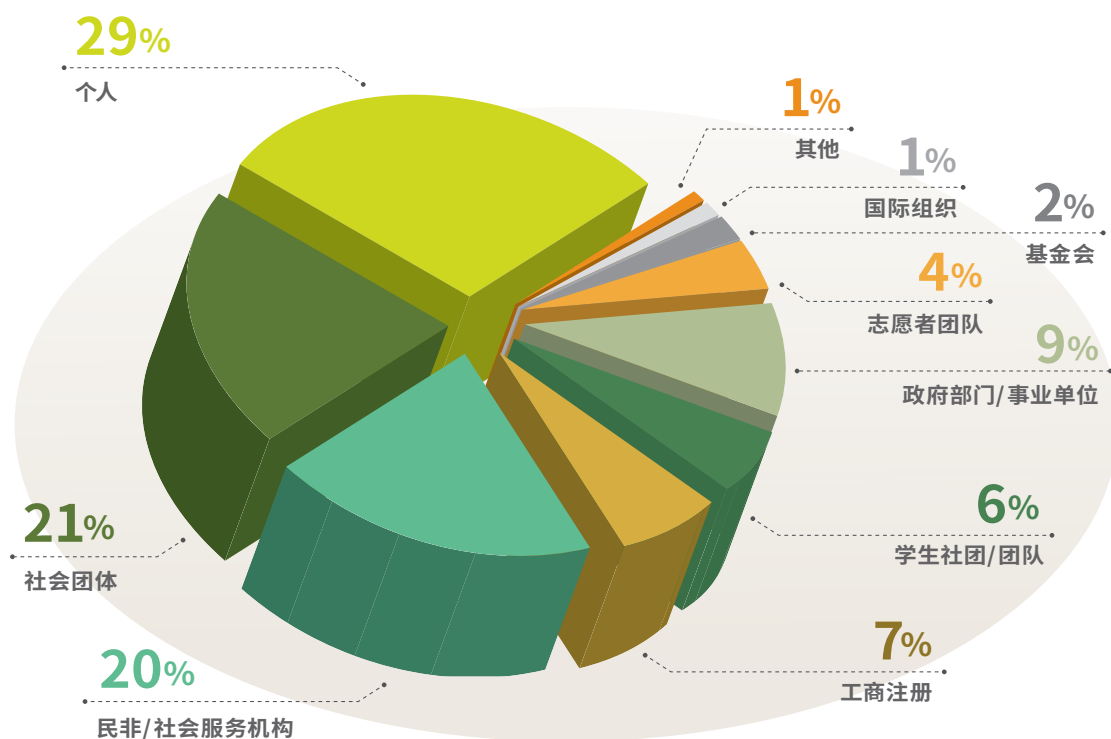


图3. 历年获奖项目的申请方注册性质分布

● 将2000-2016年分为前后两段，可以明显看到注册机构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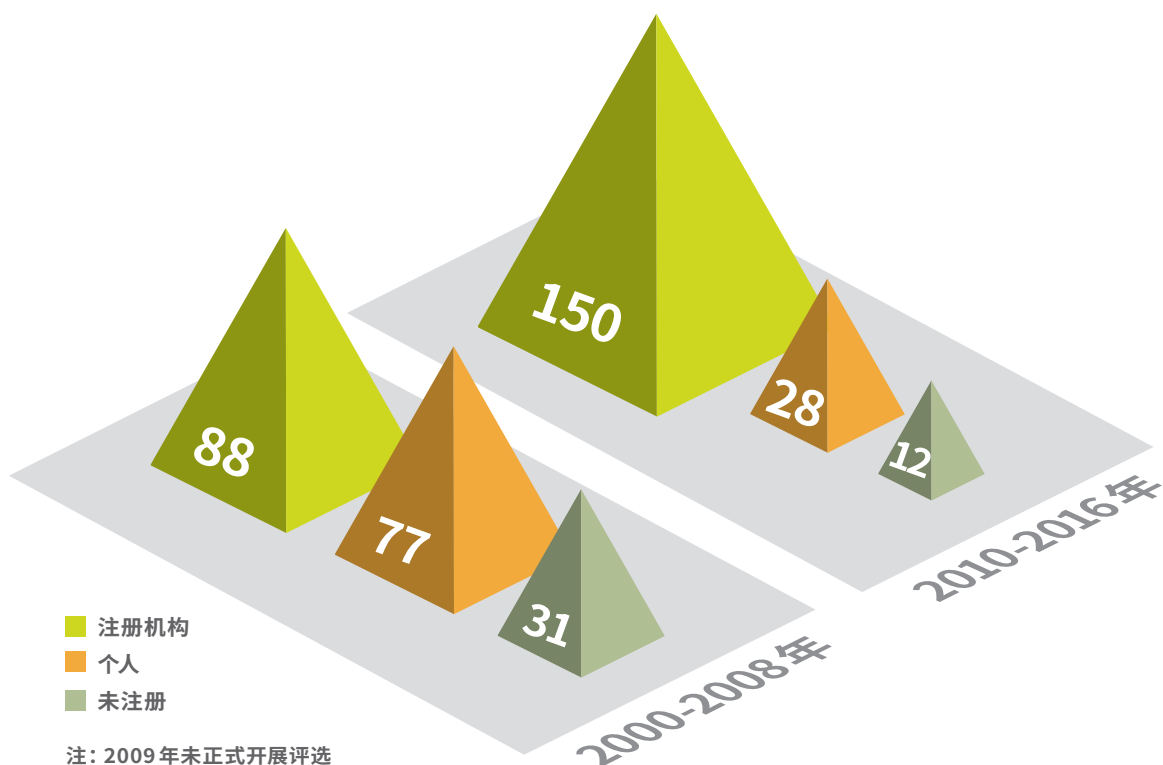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08年和2010-2016年获奖方注册性质分布

历届获奖项目运行情况

对于环保公益组织而言,有些组织以品牌项目为主,经历升级仍在继续运行,接受多个资方的支持,例如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以下简称绿色江河)在三江源地区运作的一些项目;而有些机构/团队/个人的项目有特定资方和使用期限,资金使用完毕就已完成。在问卷调查的2000-2016年间的174个获奖项目中,超过半数项目(51%)反馈已完成,46%的项目还在持续,5个项目(3%)反馈已中断(如图5所示)。中断的项目1个因组织战略规划而转型,其他4个因资金不足、人员变动、合作方等原因中断。

在“福特汽车环保奖”20年的资助过程中有些环保公益组织的品牌项目运作了十年以上,本次调查的174个项目中有40%的项目开展了十年以上,超过五年的项目总计超过一半(如图6所示),可见很多组织都以自己优秀的品牌项目获得过“福特汽车环保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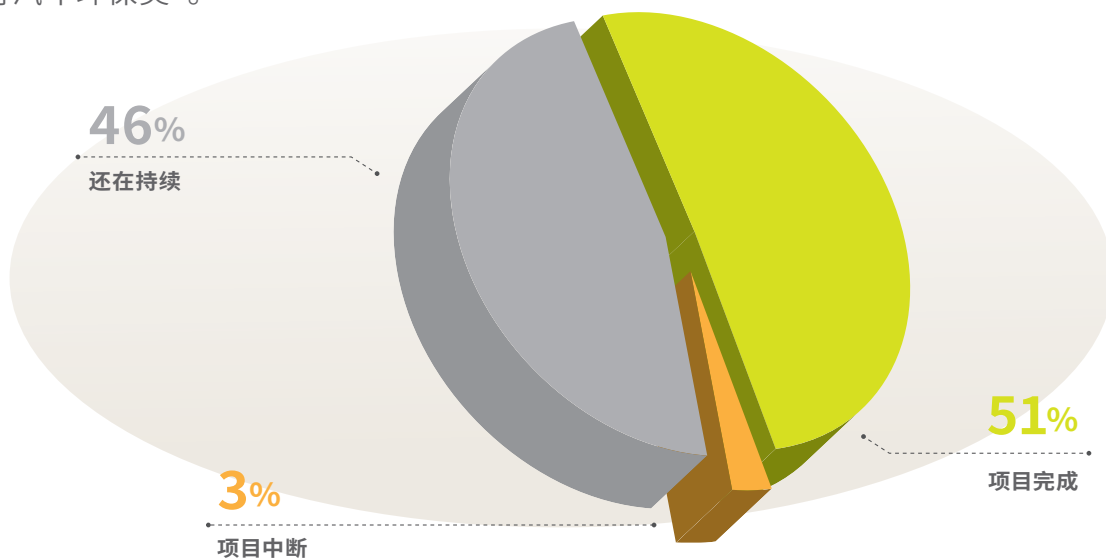


图5.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运行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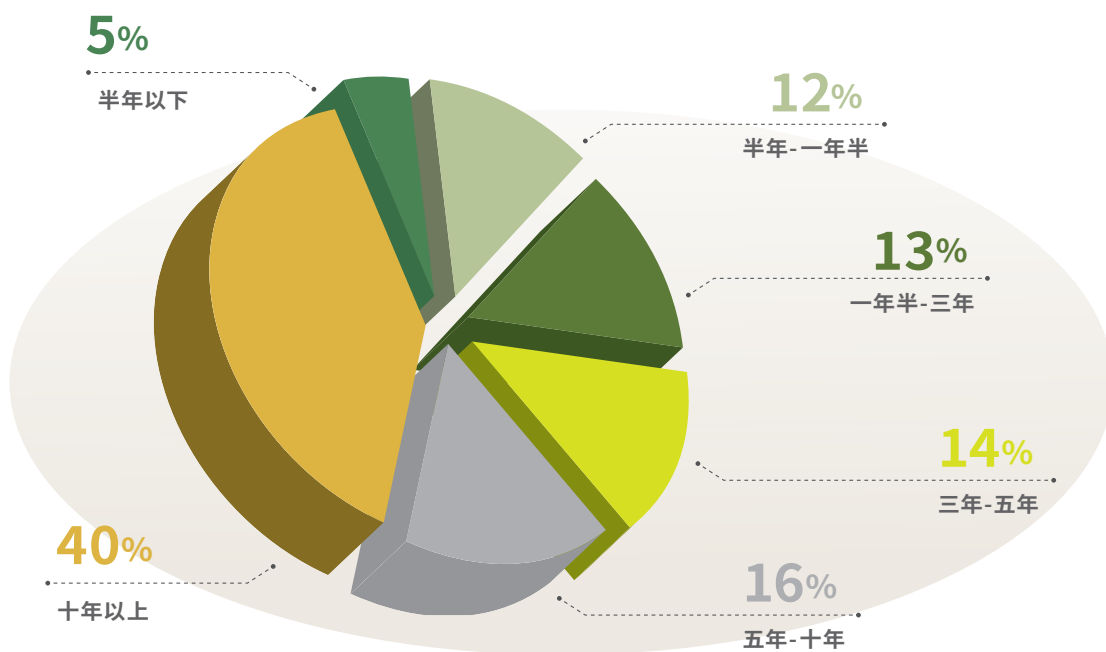


图6.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运行时间

获奖项目/组织的受益人规模和对当地的各类影响

获奖项目的受益人规模

多数环保公益项目通过物种和栖息地保护、减少污染、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甚至推动政策等，带来的是直接或间接的环境效益，同时也是为人造福，但受益人的统计往往并不容易。环保公益组织一般以统计项目直接影响的人群，如参与项目活动、接受项目培训的人群，和间接受益人，如影响的社区为主。受访的获奖项目中，52%的项目直接受益人规模在1000人及以上，43%的项目间接受益人规模在10000人以上。此外也有近1/5的项目在直接受益人部分选择不适用，多数为受益对象以环境、物种为主。综合来看，174个项目的总体直接受益人规模超过10万人，间接受益人超过85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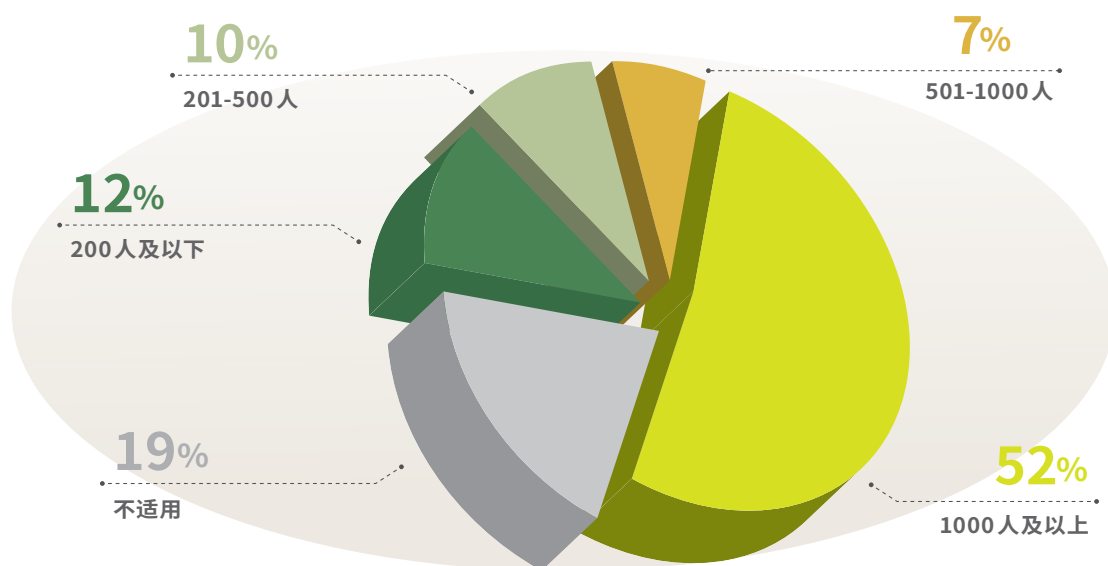


图7.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的直接受益人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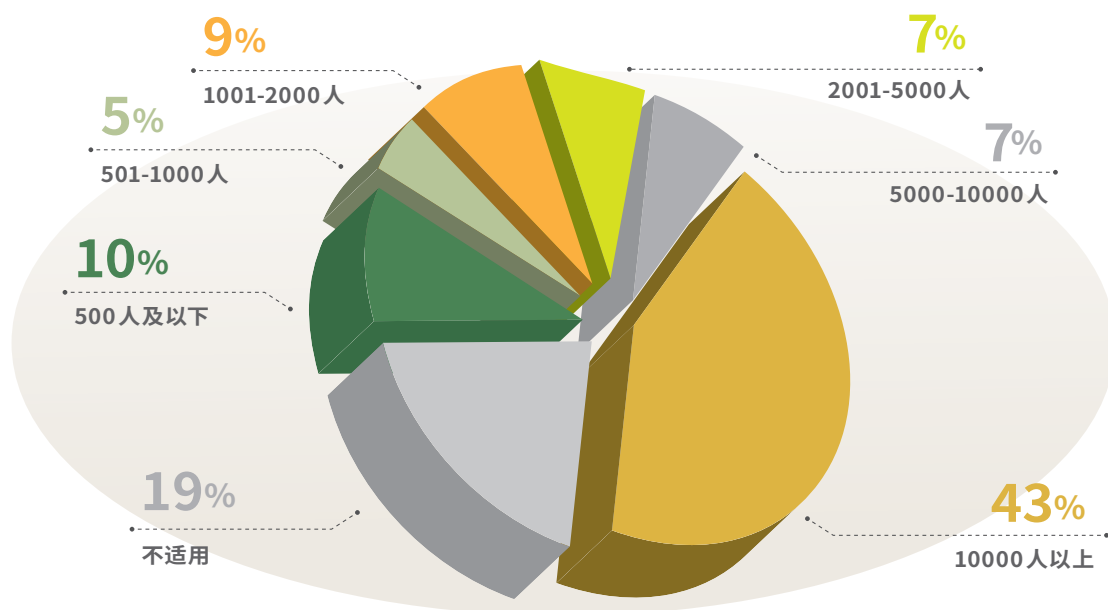


图8.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的间接受益人规模

2000-2016年获奖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社区、政府和企业的影



许多环境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环境的改变也往往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环保公益组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经常无法被合理界定。长期以来,这对环保公益组织获得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造成了一些障碍。本报告试图从四个方面来了解获奖项目的影响,包括对生态环境、社区、政府和企业的影,希望多角度体现出不同类型项目的价值。

获奖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方面

获奖项目对其项目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多数体现为保护物种数量增加、生态系统得到修复、水源水质得到改善。很多项目带来了多重效益和影响。

- **近 1/3 的受访获奖项目(60 个) 促进了保护物种数量增加或改善了栖息地。**

例如获得 2003 年野生动物保护三等奖的承德宽城山区商氏家族保护苍鹭项目,由宽城县村民商鹤羽发起,守护苍鹭近 50 年,使村边的苍鹭数量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8 只增长到 2019 年的 3000 余只。在商鹤羽和志愿者的守护下,当地的千鹤山也形成珍稀动物资源的栖息地,于 2006 年成立千鹤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超过 14000 公顷。

- **1/3 的受访获奖项目(65 个) 促进了湿地、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的修复。**

例如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中心发起的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计划(2013 年社区创意奖),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牧民之间联户协商使用草场,延长放牧半径,遏制草地确权后放牧半径缩短,牲畜反复践踏而导致的退化。

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发起的甘肃裕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自豪项目(2011 年自然环境保护-传播奖三等奖) 通过推广新型节柴灶台减少社区薪柴的燃烧,使薪柴砍伐量逐渐控制在可持续采集的范围内,保护裕河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系统。

- **近 1/3 的受访获奖项目(60 个) 促进了水源水质的改善。项目地域从华东的江苏、浙江、安徽,华中的湖南、湖北,到华南的广州、东莞等皆有覆盖。**

例如绿色浙江“吾水共治”行动(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发起,获2014年先锋奖二等奖)通过举办“吾水共治”圆桌会,邀请了当地的政府部门、媒体力量、社区公众以及河水治理专家共同探讨和对话,推动了黑臭水体的整治。

河去河从—河涌ICU项目(2014年社区参与创意奖,广州市新生活环保促进会发起)通过科普进社区的方式,推动河涌周边居民志愿者进行定时定点的河涌水质检测活动,探索以公众参与的方式推动河涌整治的有效模式。

- 30个受访获奖项目促进了空气质量改善,32个受访获奖项目促进了土壤质量改善。
- 另有68个受访获奖项目同时选择了其他影响,以通过宣传和教育带来人的意识和行为改变,间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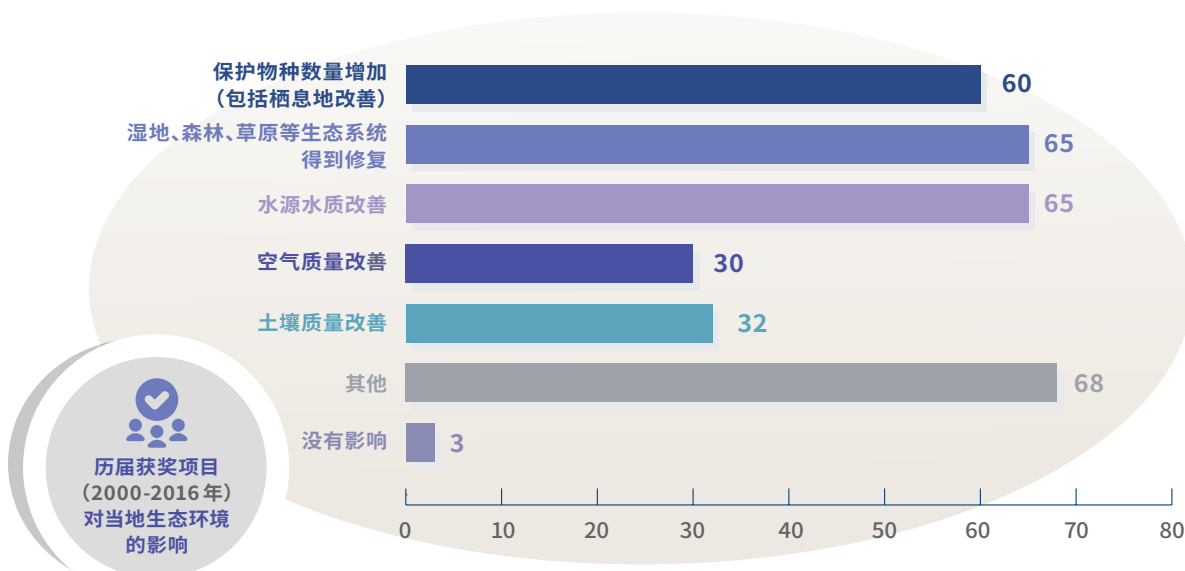


图9.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获奖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方面

- 超过80%的项目提升了当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

如自然之友发起的“大气污染公众行动倡导”项目(2015年传播奖一等奖),利用雾霾防护科普、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等行动,唤起公众关注、探究环境问题;绿主妇全面推进社区和谐项目(2015年社区实践奖三等奖,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发起)成立了环保手工志愿者队伍、一平米志愿者队伍、爱心编织志愿者队伍、酵素堆肥志愿者队伍,通过环境保护的行动带来居民内在的改变。

- 65%的项目培养了在地民间环保力量。

比如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潇湘)发起的“守望母亲河”湘

江流域民间观察和行动网络(2012年先锋奖三等奖)通过组织志愿者开展流域日常监测、工业排污监督、环境执法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推动等工作,有效提升了湘江流域环保志愿者的组织化水平和环境保护能力。

- **74个项目帮助当地发展了可持续生计方式。**

如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起的东寨港红树林养蜂项目(2014年社区参与创意奖),通过将养蜂转产项目引进保护区,以当地渔民为主体力量,转变当地社区居民过度依赖保护区资源的传统生产模式。

- **22个项目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如秸秆焚烧干预及留守女性赋能的项目(2015年先锋奖三等奖,杨凌环保公益协会发起)针对“农村秸秆焚烧”问题,以留守妇女技能及经济赋能为解决方案,带领妇女利用秸秆编织创业致富。

- **23个认为带来其他影响的项目,促进妇女、儿童、律师等特定群体直接或更有效地参与环境保护。**

比如“环保娃娃”儿童剧社社区创建项目(2010年低碳生活文明奖二等奖,妇女环境小组发起,后成立北京环保娃娃公益发展中心)通过在社区内创建剧社,由孩子们演出以环保为主题的情景剧,让孩子们以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接受环境教育;环境法律援助行动网络项目(2014年传播奖二等奖,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发起)对律师和法官进行环境法律培训,充分发挥环境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的力量。赋能当地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项目除上文提到的秸秆焚烧干预及留守女性赋能的项目外,还有杨海澜承包沙漠、建设银川沙漠生态农业园项目(2003年自然环境三等奖),让周边妇女来学习种植葡萄的技术和滩羊养殖技术,带动当地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参与环保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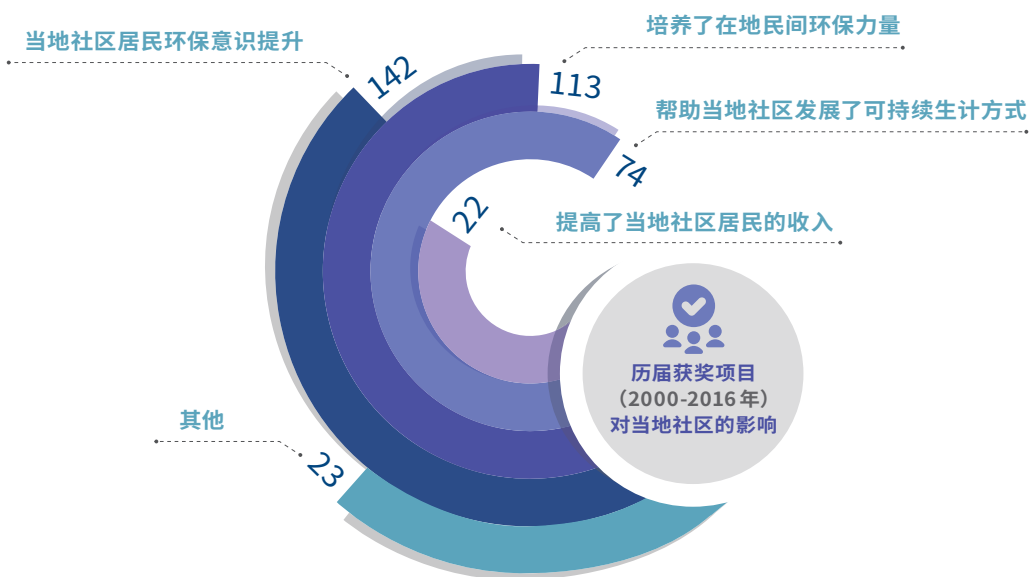


图 10.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获奖项目对政府的影响方面

在环保公益领域,各级政府的政策法规和执法往往对实际环境问题的解决最为有效,因此进行政策倡导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获奖项目对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积极为政策制订修改提供建议、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通过调查或媒体推动政府加强环境监督等。

- **57%的受访获奖项目(100个)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工作方案提供了建议并被采纳。**

例如用“倡导策略保护草原生态”的项目(2014年先锋奖二等奖,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发起)围绕“新建铁路兰州至乌鲁木齐第二双线”环评报告开展的科学实地调研为阻止环境破坏行为提供了专业的支撑,同时动员了大量媒体力量介入以及政府参与,最终促使高铁公司拨款3亿多元用于草原植被恢复。

- **53%的受访获奖项目(93个)推动了政府加强环境监督工作。**

例如水环保的绿色汉江模式(2013年先锋奖二等奖,襄阳市环境保护协会发起)通过与媒体联合制作专题节目,利用两会期间提交汉江保护方面的提案进言献策等方式,使得政府更加重视汉江保护,加强对违法排污企业的监管,重视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

- **55个受访获奖项目推动了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

- **另有29个受访获奖项目同时选择了其他影响,例如贵州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实施的少数民族社区参与喀斯特森林湿地资源保护项目(2003年自然环境三等奖),为当地政府申遗提供了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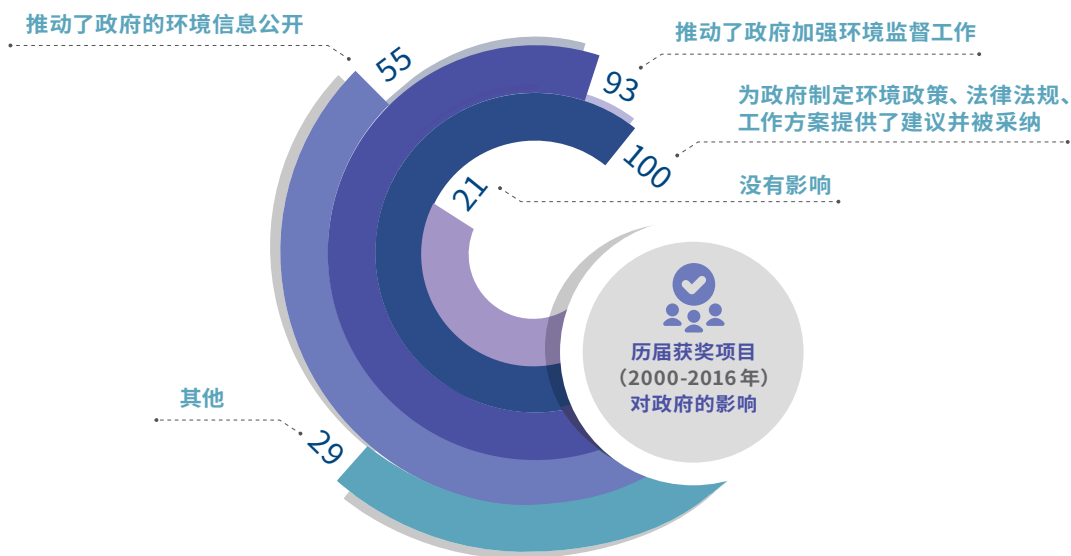


图 11. 历届获奖项目(2000-2016年)对政府的影响

获奖项目对企业的影响方面

企业对环境有着较大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直接的环境影响，如工厂不够绿色的运营对环境造成污染；另一方面企业有责任带动包括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环保公益。因此，获奖项目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或是环境整改，推动了企业员工环境意识的提升或推动其开展更多的生态环境公益活动。

- **49%的受访获奖项目推动企业开展了更多的生态环境公益活动。**

例如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2011年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提名奖,阿拉善腾格里沙漠锁边生态公益项目基地发起)通过节水灌溉模式种植各类防沙治沙灌木,并促使多家企业走进腾格里,参与种树植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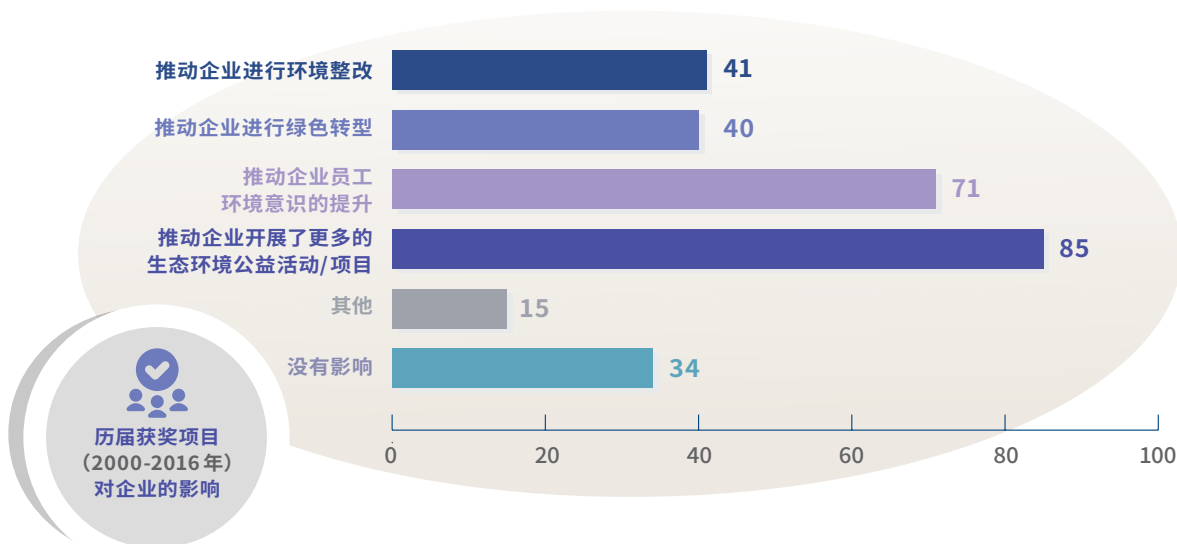
- **41%的受访获奖项目推动了企业员工环境意识的提升。**

例如“沟通促合作,同保护太湖”的项目(2016年先锋奖三等奖,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发起,以下简称绿色江南)通过开展企业环境管理培训,提升企业员工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探索建立民间环保组织与环保部门、企业、公众多方合作模式,协力促进太湖流域水污染问题的解决。

- **23%的受访获奖项目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或是环境整改。**

例如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的“绿乡村计划”(2016年先锋奖一等奖)通过向公众网络公开污染企业信息和档案,协助环保局监管企业,结合银行的金融信贷倒逼企业自我整改,实现民众、企业及政府和谐共赢。

- **另有15个项目选择了其他影响,例如同心互惠社区募捐点的项目(2014年社区参与创意奖提名奖)由北京工友文化发展中心孵化,后独立注册为企业,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开展旧衣回收再利用的工作。**



2017-2019年获奖组织核心业务的影响力

2017年开始，“福特汽车环保奖”由项目资助转变为组织资助，提供非限定性的奖金，致力于支持具有系统性思维的优秀民间环保力量，帮助其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些更为成熟的组织，其影响除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对政府、社区、企业的影响，还包括了对环保公益行业的影响。

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方面：

● 这些组织分别带来了保护物种数量增加、生态系统得到修复、水源水质改善等的环境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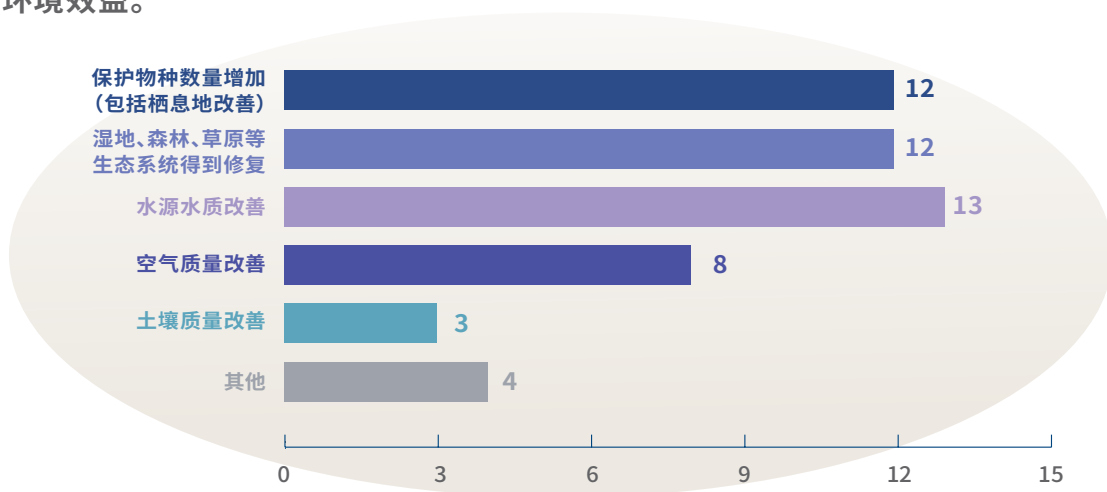


图13. 2017-2019年获奖组织的核心业务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方面：

● 21家组织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20家培养了在地民间环保力量。

例如安庆市菜子湖湿地保护协会、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以下简称美境自然)、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以下简称朱雀会)、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以下简称潜爱大鹏)等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机构,使得当地社区居民改变以往打鸟、抛弃废弃渔网等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提高环保意识和参与能力,一起参与到巡护监测、本底调查、生态导赏、手艺教授(潜爱大鹏请渔民当老师教小学生及潜水员利用祖传修补渔网的手艺将废弃渔网编织成网兜)等保护行动中来。

● 10家组织帮助当地社区发展了可持续的生计方式。

例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四川关坝村支持返乡青年,发展养蜂产业。

● 3家组织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例如朱雀会通过云南盈江举办观鸟节,发展观鸟游,建设观鸟点、客栈,做“鸟

导”，促进了当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生态、道路、住房等均有改善，当地居民的收入也因此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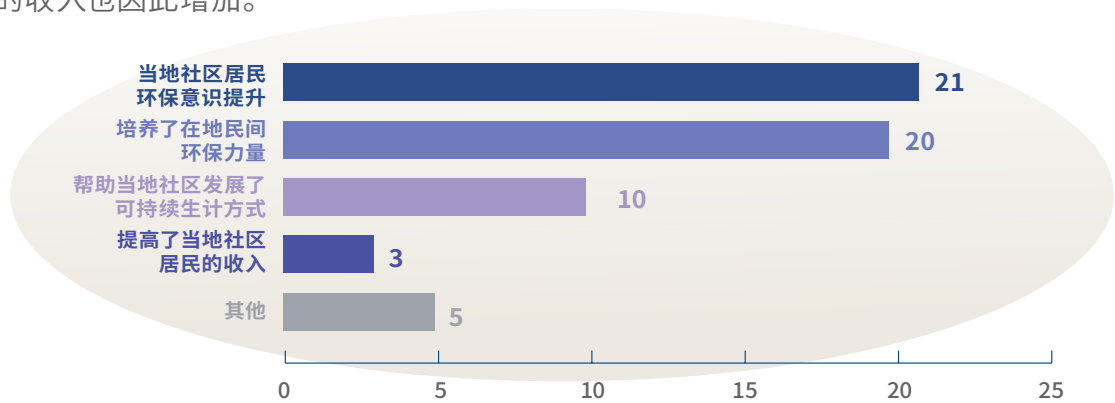


图 14. 2017-2019 年获奖组织的核心业务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对政府的影响：

- 21 家组织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工作方案提供了建议并被采纳。

例如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协会联合红树林专家委员会及人大代表共同推动“坝光盐灶村银叶树被砍事件”得到有效处理，推动将“严禁个人或单位砍伐红树林”等内容重新纳入《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保护条例》。

还有的组织与政府展开协同治理的探索，例如绿色江河的绿色驿站将环保公益机构的发展和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的诉求相结合，创立一种“政府主导、民间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企业补充”的可持续模式；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江豚协助巡护试点成为政府认可的制度探索，并有嵌入政府体系进行协同治理的潜力。与 2017 年之前相比，环保公益组织发展出更多与政府沟通协作的方式。

- 18 家组织推动了政府加强环境监督工作。

例如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天津绿领)与河北廊坊市大城县等县级环保部门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并促使政府部门开展全面核查，且实施效果好的地方政府有意愿将经验传播给其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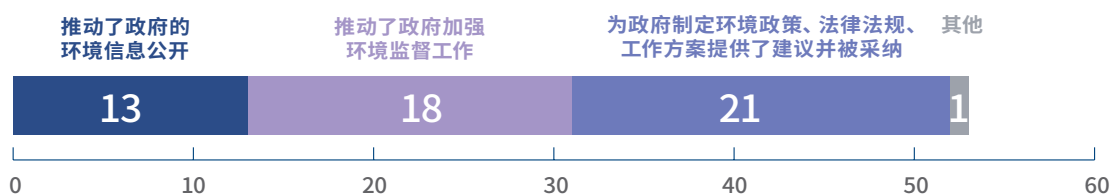


图 15. 2017-2019 年获奖组织的核心业务对政府的影响

对企业的影响：

- 16 家组织推动企业员工环境意识的提升。

例如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仁渡海洋”)面向企业志愿者的净滩项目，将环境教育融入到志愿活动中。

- 13家组织推动企业开展了更多生态环保公益活动/项目。
- 11家组织推动企业开展环境整改，9家组织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例如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主动帮助企业提升环境管理能力,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其绿色转型。对不愿主动进行绿色转型的企业,绿行者通过公益诉讼,倒逼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绿色江南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合作,提供一线调研报告,从绿色供应链入手,推动了亚瑟士、戴尔、亿滋等品牌进行环境履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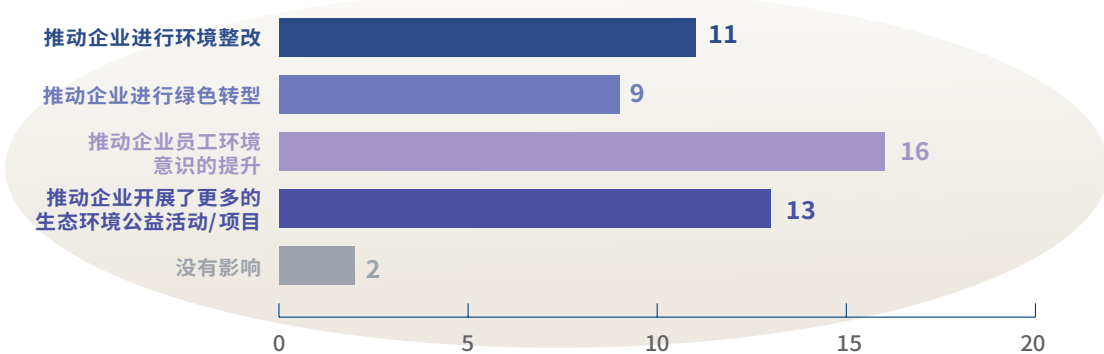


图 16. 2017-2019年获奖组织的核心业务对企业的影响

对环保公益行业带来的影响:

2017年后资助的优秀环保公益组织,很多承担了行业内的枢纽组织和议题引领者角色,对环保公益行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枢纽角色主要体现在建立议题行动网络、支持其他组织的发展、促进交流合作等;议题引领者体现在产出数据库、研究报告,形成可复制的项目、工具包等,最终促进环保机构专业化和行业内外的交流。

- 18家受访获奖组织建设了相关环保议题的行动网络,推动该环保议题的发展,约占受调查机构的2/3。

如自然之友发起建设的环境公益诉讼网络、仁渡海洋搭建的海岸线垃圾监测网络等,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和海洋垃圾议题的发展,支持相关议题下的环保行动者。

- 17家受访获奖组织产出数据库、调研报告等,推动相关环保议题的专业化发展。

例如仁渡海洋持续产出海洋公益的基础性研究报告,并与智渔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智渔”)发起创办“中国海洋公益论坛”。北京市朝阳区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帮助中国构建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体系,并持续评估实施效果,还构建了首个汽车环境影响评估体系,推进了清洁汽车与低碳燃料政策影响力研究工作。

- 16家受访获奖组织支持了其他民间环保机构及团队的发展。

例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自然观察项目中,为荒野新疆团队等在地保护机构及团队提供包括资金、生态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支持;湖北省长江生态保

护基金会支持巡护队进行民政注册和筹款等,促进在地力量可持续地进行江豚保护;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通过培训导师及“法律援助地图”、“NGO和律师行动网络”等方式,提高环保公益组织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

- **13家受访获奖组织形成可复制的项目、工具包等,并得到推广。**

例如绿色潇湘开发出“上游一公里”水源地探访行动工具包、净滩百平米工具包等标准化工具和巡河宝微信小程序,提供公众更易参与的环保行动平台。美境自然打造了白头叶猴保护小区的案例,牵头编制《社区为主体的广西自然保护小区建设指南》,将经验分享到广西其他在建的保护小区,并开发iSEA小程序,便于公众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参与自然保护。

- **12家受访获奖组织的志愿者管理模式得到推广。**

例如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扶植韶关、清远、惠东等广东其他地区成立志愿者团队,共同建设东江流域环保志愿者网络。

- **10家受访获奖组织促进了环境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例如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作为国内唯一受邀的环保组织,参加了绿色金融国际论坛暨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FI) 亚太区可持续金融圆桌会议,就“可持续保险原则”进行了主题分享;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将长江江豚保护的对外输出,在农业农村部“澜湄合作机制”的框架下,参与伊洛瓦底江豚保护。智渔承办了促进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研讨会暨派克德基金会首届中国执行伙伴年会,促进了本土公益组织与慈善基金会和科研机构在海洋环保领域的交流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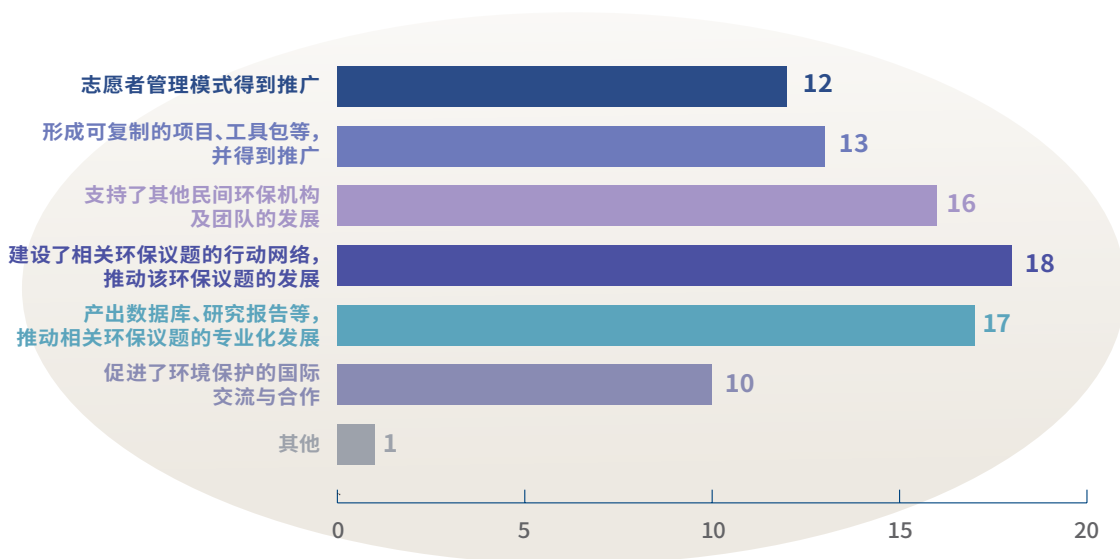


图 17. 2017-2019年获奖组织的核心业务对环保公益行业的影响

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对项目/组织的影响

二十年来，“福特汽车环保奖”不断基于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阶段和需求，调整奖项设置、奖金的分配和使用方式等等，并尝试提供了各类奖金之外的资源和支持。它既是早期对民间环保力量的开风气之先的奖励、也是近年来检验项目和组织是否足够优秀的试金石。我们一直收到获奖项目/组织的积极反馈，也想与外界分享这份奖励为不同组织带来的不同价值。

● **获奖对项目的改变：**90%的受访者认为获奖对项目执行有积极影响；85%的受访者认为获奖对促进执行团队的发展作用明显；82%认为对社会影响力有积极影响；77%认为获奖对促进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关系方面作用明显；74%认为获奖对促进与当地其他合作方的关系方面作用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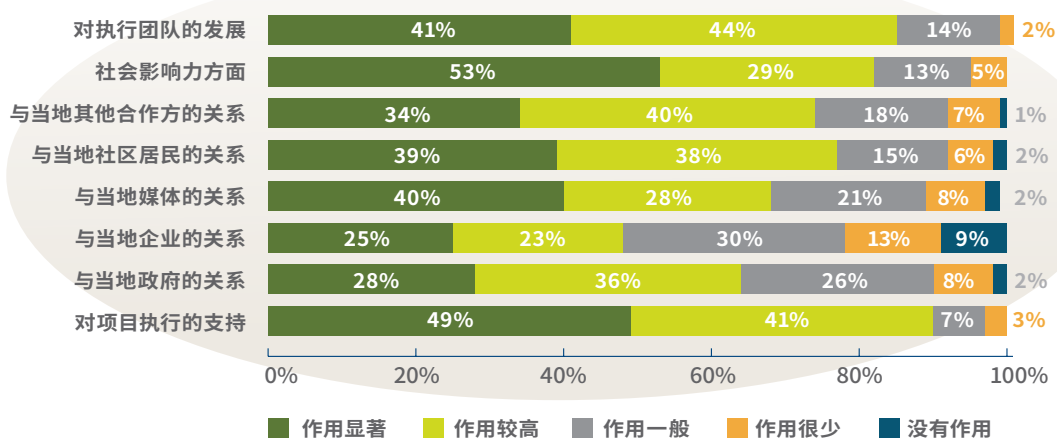


图18. 获奖之后对项目(2000-2016年间获奖)起的积极作用的程度

● **获奖对奖项申请机构/团队/个人所起的作用：**58%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曝光程度提高，56%的受访者对外交流机会增多；超过1/3的受访者得到了更多的政府认可和支持，近1/3获得了更多的筹款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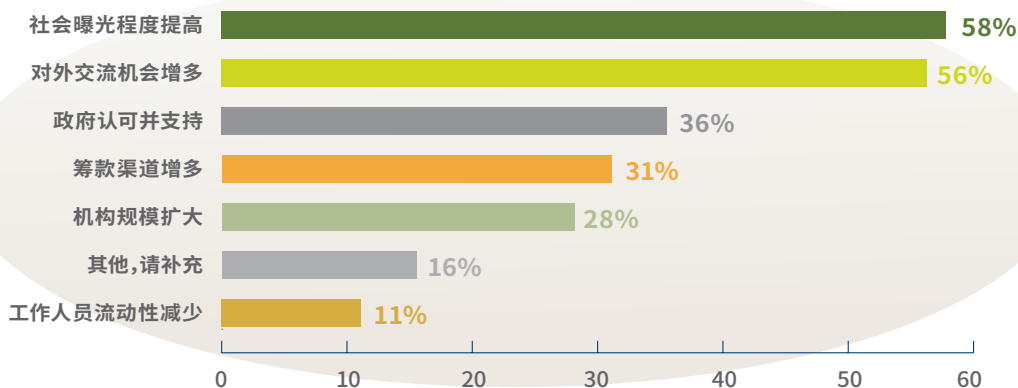


图19. 获奖对奖项申请机构/团队/个人所起的作用

2017-2019年，“福特汽车环保奖”为获奖组织提供非限定性奖金，此次调查，我们也了解了3年间的获奖组织对于奖金的使用方式和看法。

全部受访组织都认为非限定性资助有帮助，其中87%认为很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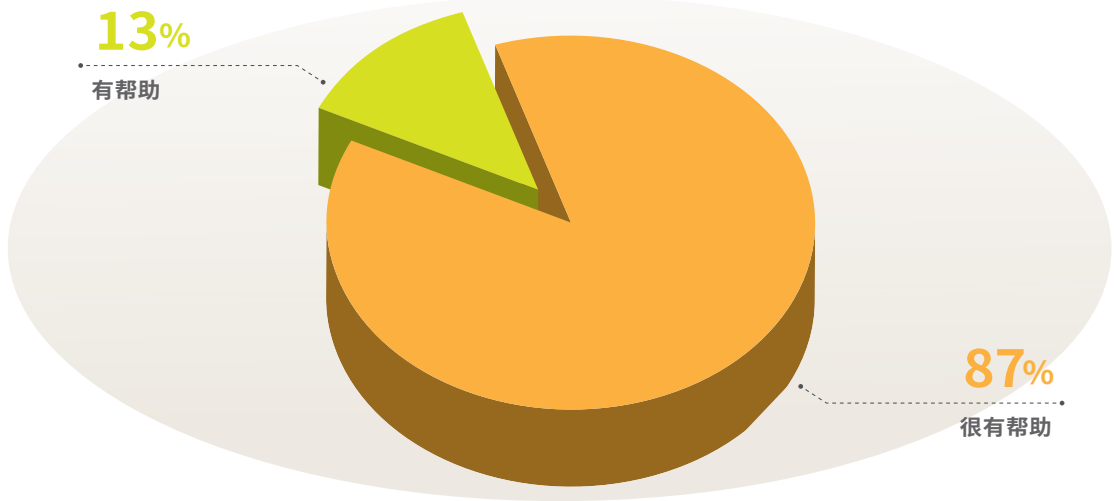


图 20. 2017-2019 年获奖组织对于“福特汽车环保奖”非限定性奖金的看法

很多受访者表示将奖金用于机构所需的多个方面：

- 20 家组织使用部分资助支持内部员工发展。
- 15 家组织使用部分资助支持原有执行项目的发展。
- 12 家组织将部分资助用于开发新项目。
- 10 家组织将部分资助用于支持机构传播及筹款工作的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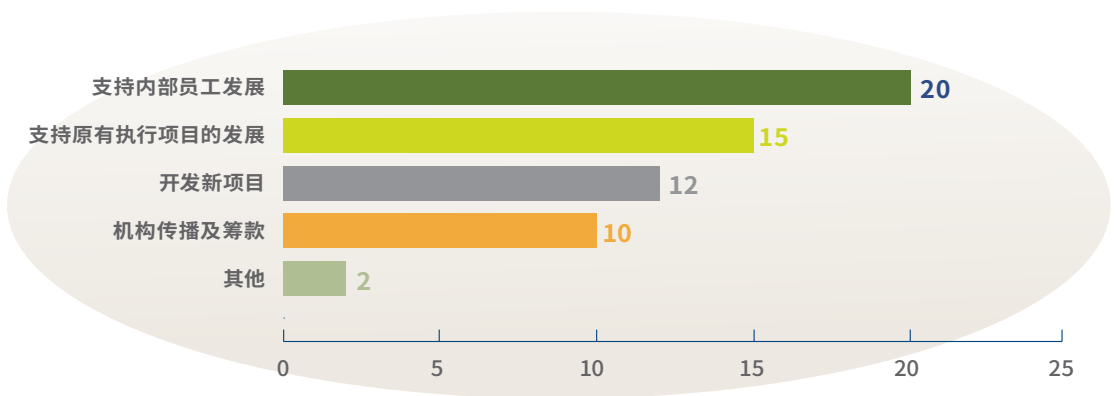


图 21. 2017-2019 年获奖组织对于非限定性奖金的使用方式

获奖方(机构/团队/个人) 现状

本次报告还调查了历届获奖方的财务、人员、行业合作情况等现状。“福特汽车环保奖”一直以民间环保力量的需求为资助的出发点,希望这部分内容为下一阶段的资助提供参考。同时,也作为这个时间节点环保公益行业情况的一份记录。

参与本次调查的169个获奖方中,34个为个人获奖,135个获奖机构/团队中,有12个不再运营或核心成员离开机构,本报告统计了余下123家机构/团队的机构全职人员、核心志愿者、行业合作数量、年筹资额和资金来源的情况。

机构/团队筹资数额及资金来源

- 123个机构/团队中,约半数机构/团队过去2年平均筹资额不超过50万;13%的在50-100万元,15%在100-200万元,年筹资额超过200万元的机构/团队占总数的1/5左右。
- 其中年筹款额在1000万以上的机构/团队有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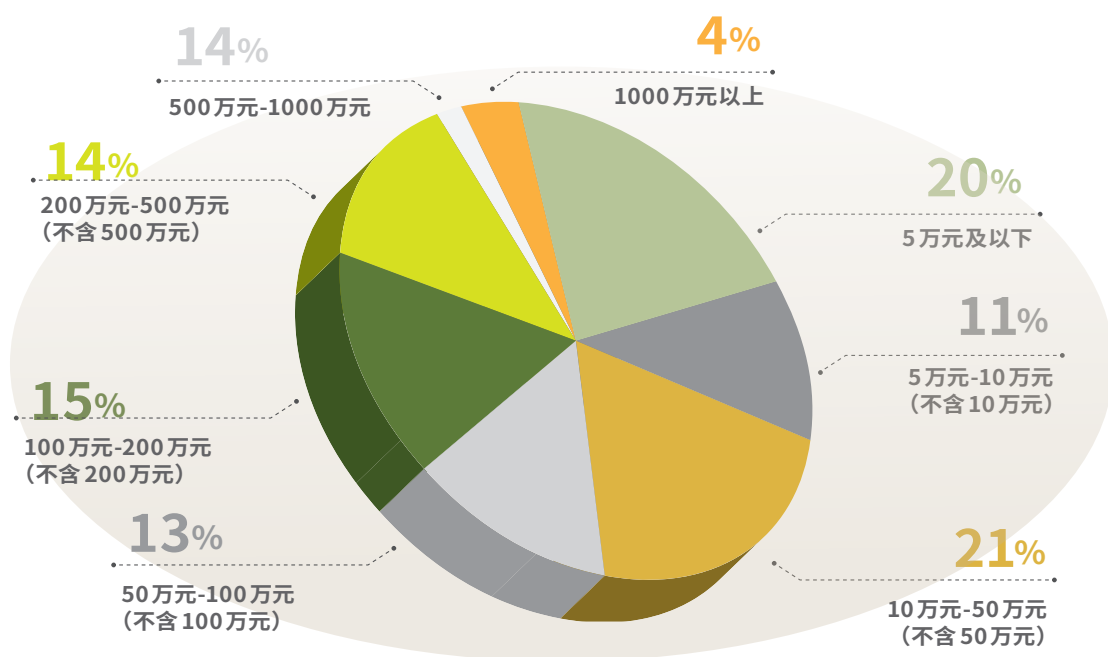


图22. 历届获奖机构/团队过去2年平均筹资额

从资金来源来看,主要为政府购买服务、国内基金会资助、个人捐款、企业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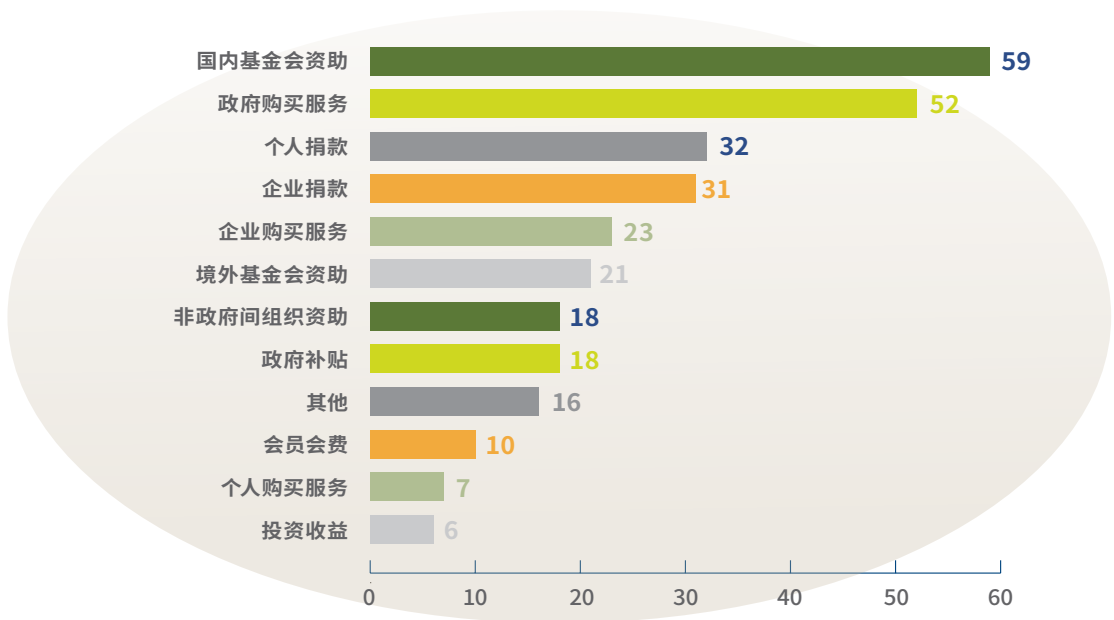


图 23. 历届获奖机构/团队主要资金来源(前三位)

机构/团队工作人员情况

123家机构/团队中,42%的全职员工人数在5人及5人以下,20%的全职员工人数超过10人,另有13%无全职员工,也有2%的机构/团队全职员工超过5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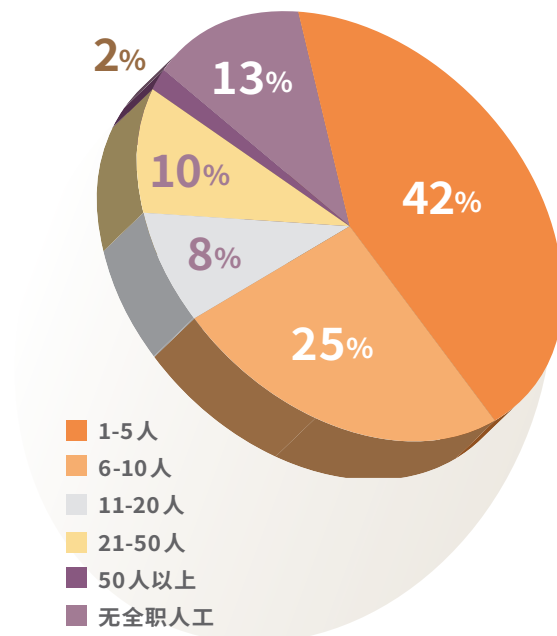


图 24. 历届获奖机构/团队全职人员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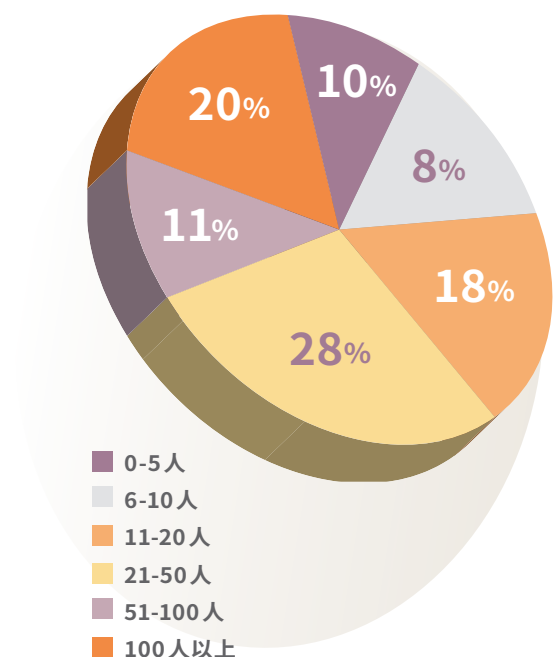


图 25. 历届获奖机构/团队核心志愿者人数

核心志愿者人数方面,约60%的机构核心志愿者人数不超过50人。

机构/团队行业合作情况

环保公益组织数量和规模不大,联合及合作较为普遍,这是集中优势资源开展项目及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我们将从机构/团队的长期多次合作、项目合作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各机构/团队的长期/多次合作现状来看:

- 一些受访的枢纽型组织与其他环保公益组织的合作较多,例如仁渡海洋和朱雀会分别与70家和50家其他环保公益组织形成长期合作关系。两家机构分别推动了海洋保护和鸟类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北京同心互惠社工服务中心和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也分别与70家和126家其他社会组织达成长期合作关系。
- 一些环保公益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较多,参与到一些议题的国际进程中,例如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北京市朝阳区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自然之友,均有10家合作关系。
- 总体而言,受访机构/团队与企业、其他环保公益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最多,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较少。具体情况合作情况如图2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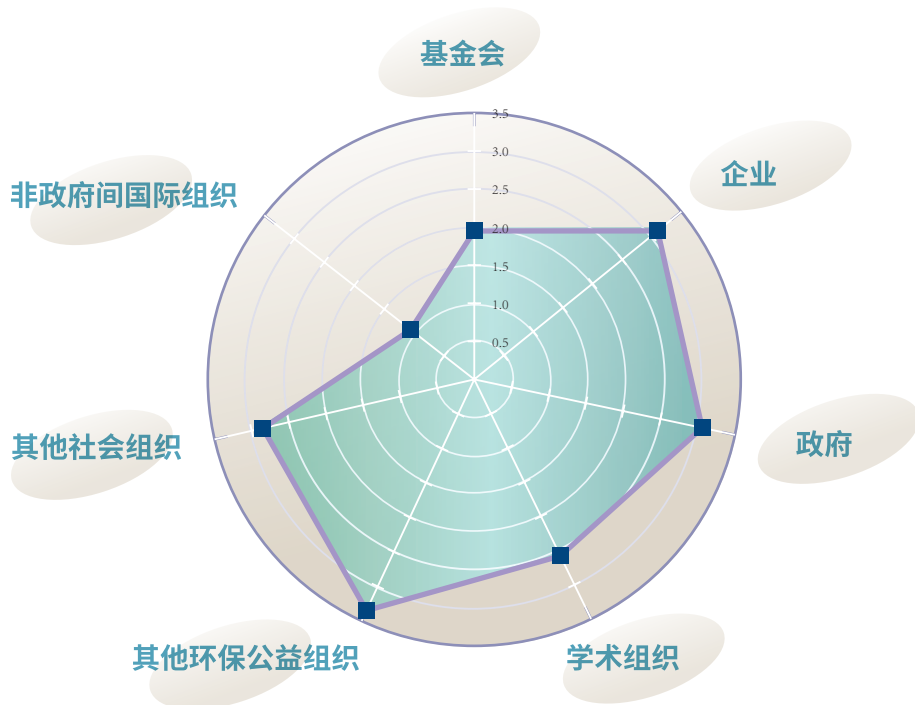


图26 获奖机构/团队的长期/多次合作现状

从各机构/团队的项目合作现状来看：

- 北京环保娃娃公益发展中心与多达 800 家学术机构达成单个项目的合作,主要为学校合作,体现了其核心项目的推广情况。
- 美境自然与 60 家基金会达成单个项目的合作,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自然保护机构之一。
- 与超过 50 家企业合作的有北京市朝阳区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上海众谷公益青年发展中心、自然之友、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历年分别有 100、60、50、55、50、50 家企业合作项目。
-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历年分别与 200 和 50 家政府部门达成合作关系。
- 作为枢纽机构,自然之友与 100 家环保公益机构和 50 家其他社会组织有过项目合作。仁渡海洋、天津绿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均与 50 家环保公益机构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

受访机构/团队的平均项目合作情况如图 2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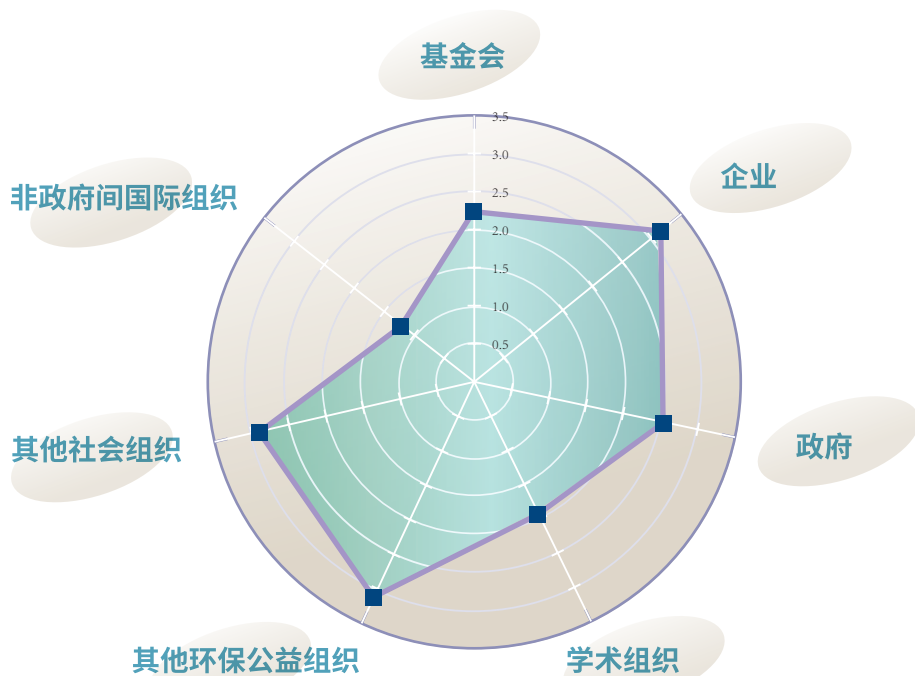


图 27 获奖机构/团队的单次合作现状

个人获奖者现状

本次调查涉及的34位个人获奖者中：

- 有半数仍以个人形式从事环保公益工作。如因灵山青少年生态环保基地项目获得2003年环境教育奖提名奖的徐凤翔，仍在从事科普教育，对院校学生介绍高原生态的价值及对其的保护；因用影像保护藏羚羊而获得2016年传播奖三等奖的裴竞德，仍以个人形式从事自然影像保护工作。因坚持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治沙造林而获得2001年自然环境奖二等奖的殷玉珍，和丈夫一起在乌审旗治沙30多年，将7万亩沙漠变为绿洲。
- 17%的受访者已成立环保公益机构，6%则加入了其他环保机构。12%选择其他的受访者中，易解放（因内蒙古荒漠化治理生态林建设项目获得2010年自然环境保护奖一等奖）的NPO绿色生命，挂靠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内蒙古青年发展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另有5人离开了环保公益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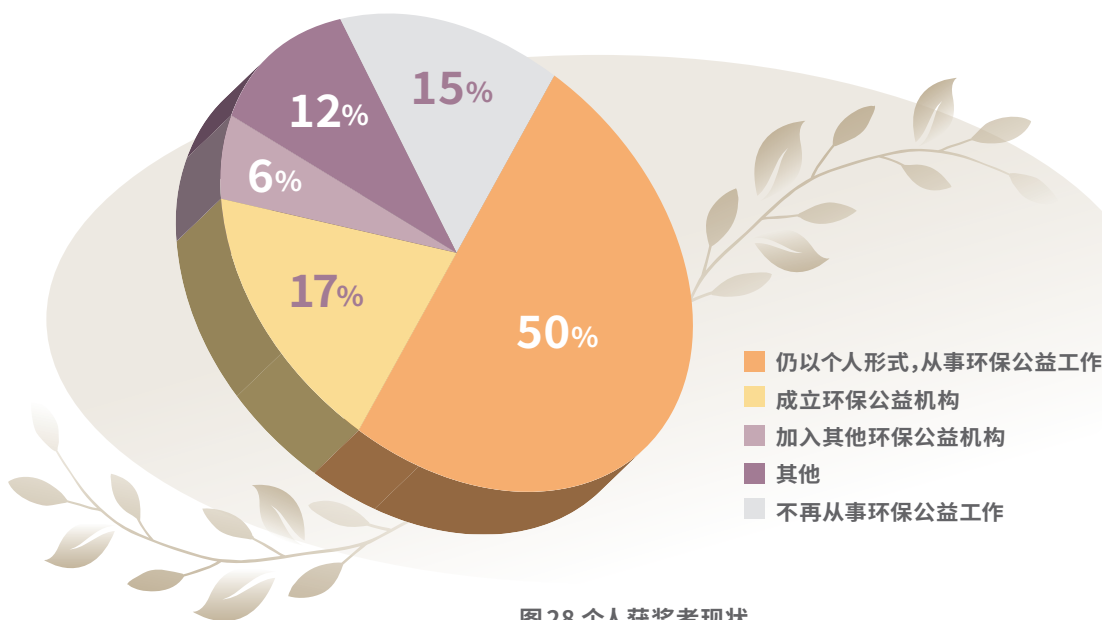


图28 个人获奖者现状

获奖方对未来的工作议题和工作手段的看法

本报告还了解了历届获奖方对未来环保公益行业的工作议题和工作手段的看法。

- 议题的关注度与受访者的工作领域分布基本一致。物种保护、自然与环境教育、湿地保护、水污染防治的关注度较高。
- 从工作手段来看，92%的受访者认为“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手段，72%选择了“环境知识的教育与宣传”。也有半数受访者选择了“推动信息公开、公益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研究与倡导”，“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近40%的选择。传统工作手段之外，在其他选项中，亦有受访者提出应注重“面向市场开展社会化运营”、“跨界联动推动公益行动”，“进行环境议题的影响力传播”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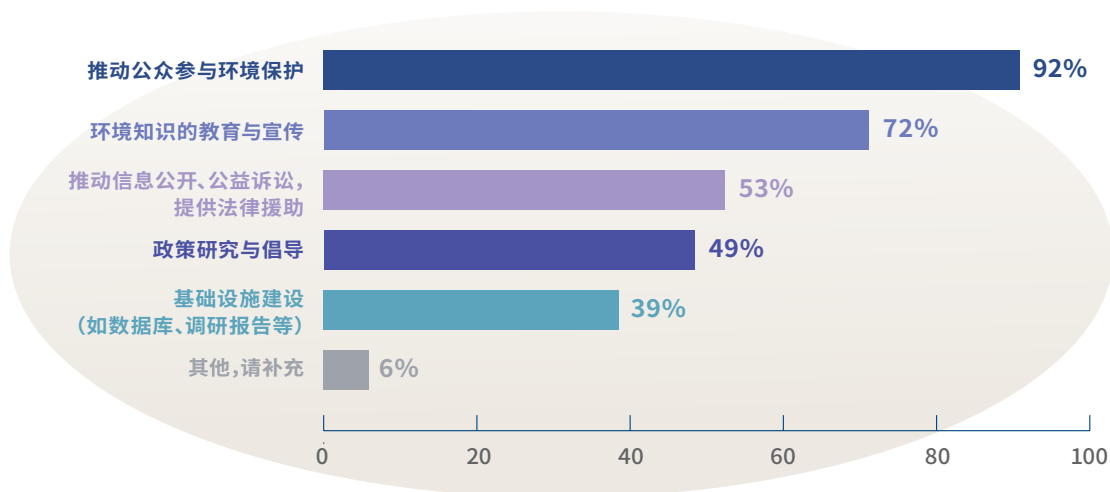


图 29. 历届获奖方认为环保公益行业未来最有价值的工作手段



一辈子只守一座山

——滇金丝猴守护者肖林、张志明、奚志农

红润的嘴唇，洁白的面庞，滇金丝猴有着最肖似人类的长相。它们是我国独有的高山生灵，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人迹罕至的树林之中，来无影去无踪。它甚至曾经只是藏区的一个传说，直到19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人才在云南德钦证实了滇金丝猴的存在，但是之后几十年的销声匿迹，让很多人觉得滇金丝猴已经灭绝。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滇西北的枪声带来了八具滇金丝猴的尸体，也带来了滇金丝猴重现江湖的消息。

滇金丝猴还在！它们生活在哪？我国到底有多少滇金丝猴？他们是不是面临危险？我们怎么保护它们？

肖林：和滇金丝猴有关的一生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唯一以滇金丝猴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肖林（藏名昂翁此称）是保护区成立之后的第一批正式员工。当1992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龙勇诚和美国加州

大学博士柯瑞戈(Craig Kirkpatrick) 计划在这里选择一个滇金丝猴群进行长期野外观察的时候,肖林和他的朋友忠泰次里作为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的技术骨干加入了考察工作,希望通过长达三年的野外跟踪监测,收集第一手资料来研究滇金丝猴种群生物生态学的习性。

在**海拔4300米**的崩热贡嘎,他们在木头框架上蒙塑料布,建了简陋的“家”,一头扎进了找猴子的漫漫征途。很多人觉得野外徒步是运动、是趣味、是浪漫,但是野外科考却完全不同。每个月规划滇金丝猴研究的时间,是雷打不动的15天,很多人觉得藏族人天生可以在高原上健步如飞,但是4000米的海拔实在是太高了,每个人的行李都有50到60斤,里面装着半个月口粮、锅碗瓢盆、相机、望远镜、脚架、换洗衣物、茶叶、盐巴、青稞酒……每走一步不仅要靠头顶到脚尖协同发力,还要时时处处给自己打气。

行李已经那么沉了,猴子却也那么难找。



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极度警觉,要是去问生活在滇金丝猴栖息地附近的藏民,随便一个小孩子都见过黑熊、白腹锦鸡,但是说起滇金丝猴,恨不得只是老猎人口口相传的一个传说。傈僳族人的方言管滇金丝猴叫“灰白的猴子”,要知道滇金丝猴可是黑白色皮毛红色嘴唇,难不成世代比邻而居的人看到的从来都只是滇金丝猴风一般略过的模糊混色的身影?

滇金丝猴是格外能跑的选手,多年家域面积甚至能达到50万平方公里,属于最能溜达的灵长类动物。这主要是因为滇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松萝(一种树挂地衣),松萝

被取食后生长恢复的周期较长,滇金丝猴需要在很大地域范围内转移,才能保证回到最初取食的位置时松萝已经恢复完全,可以经得住继续食用。因此要寻觅滇金丝猴的踪迹,就需要把考察范围扩大扩大再扩大。

所以只能找啊找,一边背着大包慢慢地走,一边心里祈祷主管野外科考的神(不管是谁)能够显灵。

肖林的好运要等到上山的第二年,1993年的4月3日,肖林和钟泰背着沉重的包袱又一次穿行在寻找滇金丝猴踪迹的路途上,忽然林间响起了奇怪的声音,一群嘈杂的叫声夹杂着树枝折断的噼啪声飞速靠近,黑白中夹杂着红色的身影从他们头顶刮过,未作停留又急急而去。

进入白马雪山第十个年头,投身滇金丝猴保护的第十个年头,肖林终于得以和这群神秘的生灵会面。他们立刻拔腿就追,但是山林是猴子的地盘,人要深一脚浅一脚的负重前行,猴子在枝丫上一荡就是好几米,自然是追不上的。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之后的科考中,肖林见到很多次滇金丝猴,白马雪山的这一个猴群因为他们坚持不懈的寻找,逐渐适应了人类的存在而变得不那么踪迹难觅,他们因而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家庭结构、主要食物、迁徙习惯,甚至拍到了迄今为止滇金丝猴在野外自然环境中最清晰生动的一张照片。

三年的科考给肖林的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自传《守山》中写道:“野外的三年正是我脱胎换骨的深深一眠,我在山里的时候便明白:这辈子如果和这些野生生灵断开联系,我将是个被剩下的可怜鬼。”



肖林

之后他一直走在保护的一线，从参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建设，到创立致力于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白马雪山共管协会”，再到2017年参与滇金丝猴全境大巡护，白马雪山的环境，白马雪山的生灵，一直是他的表情之所系。2016年“白马雪山共管协会”用“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奖金，在白马雪山中的日尼神山上清除动物陷阱、邀请僧侣利用宗教众生平等的知识保护动物、资助僧侣和村民的野外巡护。肖林对白马雪山的爱，通过协会、寺庙、社区的合力，慢慢辐射出去，让更多人加入了守山的道路。

张志明：放下拿了十三年的猎枪，走上三十一年巡护之路

自从1989年为龙老师担任过云南老君山滇金丝猴群科考的向导之后，张志明就彻底上了龙老师的“贼船”，放下了拿了十三年的猎枪，开始三十一年义务巡护。

巡护工作当然也要漫山遍野地找猴子。张志明是世代与滇金丝猴比邻而居的傈僳族猎手，即使放下了猎枪，直觉和天赋还是在的，寻找兽道、分析粪便、辨别食迹总是比一般人强很多。滇金丝猴虽然是漫山遍野溜达的“善跑型”选手，张志明也总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几十年巡护下来，张志明已经成了滇金丝猴生态行为学的专家，他可以每天填写野外调查和观察记录，会看地形图和使用GPS，拍摄一手的滇金丝猴照片或者录像，这些都是巡护工作中浪漫的部分。

但不浪漫的部分总还是占大多数的。

基层巡护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反盗猎，可难就难在张志明并不是有编制的执法人员，在2003年之前甚至连“滇金丝猴保护宣传员”的称号都没有，在山里遇上荷枪实弹的盗猎分子，只能“连蒙带骗”，让他们相信山里的所有滇金丝猴都有编号有GPS定位，只要猎杀一只就会被武警官兵追缉到天涯海角。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候几十年间也只有几次，大多数时候张志明面临的“盗猎分子”，其实只是迫于生计上山捕猎的同村邻居，挡人财路总是要招人记恨，而让他们转变思路认识到“安山下扣，吃的不够；捞鱼摸虾，饿死全家”却也是难上加难，但张志明依旧坚持了下来。

巡护中最不浪漫，却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走。

一个人，两条腿，一座山，一直一直一直走。

从张志明的家到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单程有14.5公里的山路,其中8.8公里是人迹罕至的山林路,走一趟要4个小时,往返就是8小时,遇上猴群移动,要走的路程只多不少,一天中眼睛只要睁着,就是不停地赶路。巡护开始的头几年,山上没有可以住的巡护站,张志明每天晚上都要赶回山腰中的家,否则就只能露宿野外。年轻的时候,张志明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重复这个路程。直到2001年,张志明才在北京动物研究所的支持下,用1.5万元在巡护路线上盖了一个小小的监测站,那之后单次巡护可以延长为两天,中间在监测站勉强过夜,节省下来的8小时往返家中的时间,可以用来巡护更大的滇金丝猴栖息地,张志明的巡护节奏也变为了“巡二休一”。2013年,张志明又用“福特汽车环保奖”先锋奖的奖金对监测站进行了进一步翻修,加盖了三间木头房子,巡护的夜晚不用在四面漏风的监测站将就,而是可以生火做饭,睡个好觉。巡护站周边的山路也进行了整修,大片原木铺成的台阶虽然简陋,下雨的时候总算不用在湿滑的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2019年张志明退休之后,他的侄子接棒巡护着老君山的滇金丝猴,这个小小的巡护站依然是他们翻山越岭的路上的避风港。

但老君山的滇金丝猴是幸运的,张志明的“倔”让他三十一年从未放弃,即使中间两年没有外界资金支持,他也依旧坚持着巡护。三十一年间,张志明拆除了1000多只兽套,也再没有见过惨死在猎枪下的滇金丝猴实体。老君山的滇金丝猴种群已经由80年代末期的一百多只,上升到后来的三百四十只左右,从几乎灭绝恢复到目前趋于正常的状况。



2019“福特汽车环保奖”年中回访,
张志明与回访人员交流

龙勇诚老师总是说对不起老张,和龙老师一起保护滇金丝猴的巡护员虽然一直在光荣的岗位上,但最终没有实际收益,生活水平其实一直是下降的。1990年至2000年的11年时光,张志明每月的工资只有30元;2000年到2010年,工资才慢慢涨到600元;2011年和2012年,800元;2013年,1000元。2013年大自然保护协会代张志明申请“福特汽车环保奖”,投入一栏是这么写的:“这是一项没有计算过投入,也无法计算的事业,因为它代表着一个人一生的付出。”

滇金丝猴保护几十年,传奇的人物、能讲的故事有太多太多,“福特汽车环保奖”很荣幸在这个历程上为一些伙伴提供支持,与他们同行。

奚志农：滇金丝猴身影观察家

高高瘦瘦的身形,黝黑的皮肤,常年带着的迷彩棒球帽,奚志农一看就是常年泡在野外的艺术家。他的成就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是中国最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之一,是第一个在野生生物摄影年赛获奖的中国摄影师,是第一家依靠民间力量筹措完成的自然中心——苍山自然中心的发起人,而对于滇金丝猴而言,他是这个物种第一张“证件照”的摄影师,更是这个物种“家族史”的见证人。

而头衔之下,他是一个深深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者。



奚志农

奚志农第一次摸相机是在1983年,当时他在一个科教片摄制组担任摄影助理的助理,为了拍鸟,摄制组从动物园请了位技师,负责弄顺鸟毛,再用绳子将鸟拴在树上以供拍摄,如果“鸟演员”实在不听话,就找一个鸟类标本放在树枝上拍摄。奚志农很疑惑,满山的飞鸟自由自在,为什么不去拍它们而拍标本呢?

“那我来拍。”

1992年，他加入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深入白马雪山，第一次试图拍摄滇金丝猴。但猴影难觅，即使侥幸听到猴群移动的声音，不等抬头去看它们早已无影无踪，也许是缘分未到。1992年9月的一天，在奚志农和同伴离开营地寻找猴子一周无果之后，他们在营地附近发现了新鲜的猴粪。摄影师的本能瞬间被激发，奚志农从3900米的沟底一口气冲到4300米的山脊线，随便找一块石头把外套甩上去将摄像机垫起来，调好焦距就开始拍。镜头里，一个猴子家族在云杉树枝上休憩，大公猴端坐在树干上，慢条斯理地啃松萝，两只母猴依偎在它两边，其中一只母猴怀里还抱着一只滇金丝猴宝宝。

滇金丝猴这一中国独有的美丽物种，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态照。多年之后，他的一幅名为《**幸存者**》的滇金丝猴照片在英国“BG野生生物摄影年赛”上获得“濒危物种类”单项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被誉为“自然摄影奥斯卡”的比赛上获奖。

2002年，奚志农历时十年拍摄的《**神秘的滇金丝猴**》获得了第11届自然银幕电影节的“TVE奖”。2012年到2015年，他又带着拍摄团队蛰伏三年，拍出了第二部滇金丝猴纪录片《**云上的家庭**》这一次奚志农不仅讲了滇金丝猴的美，更讲了滇金丝猴如何通过独特的群体构成应对极其恶劣的高海拔生活环境。《云上的家庭》后来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自然栏目进行了播出，在IMDb上评分8.1。2015年，《云上的家庭》也获得了当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不仅仅是因为拍摄背后的坚守与付出，更是因为，奚志农讲出了中国物种的故事。

从《神秘的滇金丝猴》到《云上的家庭》，奚志农用13年的时间，由浅入深地记录了滇金丝猴的“家族史”，在他的影像里，滇金丝猴从跳跃在云端的灵兽变成了喜怒哀乐仿佛与人类相通的人类伙伴。开始有许多人选择与奚志农同行：2004年奚志农创办的野性中国工作室发起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训练营是公益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培养中国本土的自然摄影师，2010年野性中国工作室又发起“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资助中国自然摄影师对中国濒危物种进行拍摄。滇金丝猴的身影背后，多

了无数个如同当初的奚老师一般的追随者，他们拿着相机穿梭在云南烟雾缭绕的丛林间，数日的蹲守往往只能收获一两张滇金丝猴的掠影，但他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珍贵的照片不仅停留在影展和书里，更是通过2020年上线视觉中国的“中国濒危物种影像库”，全面开放给了公众。许多中国人从他们的影像里认识、爱上滇金丝猴，走上保护滇金丝猴的道路。

在十余年的发展中，奚志农的脚步从滇金丝猴扩展到了其他物种身上。“中国濒危物种影像”2012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时候，刚刚资助了24位摄影师的濒危物种拍摄计划，覆盖北京、重庆、云南、广西等地区，共计拍摄超过50个濒危物种，留下万余张宝贵的照片。而八年过去了，奚老师“麾下”的摄影师已翻倍，相信这个从一张滇金丝猴“证件照”开始的故事，将会谱写出更为壮丽的篇章。

获奖故事

- 张志明于2013年获“福特汽车环保奖”先锋奖一等奖(滇金丝猴野外检测巡护项目)。
- 肖林创立的白马雪山共管协会于2016年获“福特汽车环保奖”社区实践二等奖(“清除垃圾,还神山纯净”项目)。
- 奚志农及其创立的组织“野性中国”在2012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传播奖二等奖(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2015年获得传播提名奖(“云上的家庭”滇金丝猴纪录片项目)。

挚爱江河源 ——三江源守护者杨欣、 扎多、阿旺

现在说起三江源,大家会想到什么?

可能会想到昆仑山的皑皑白雪,会想到怒江的几字形大拐弯,会想到成群的藏羚羊和斑头雁,也会想到世代生活在这里、虔诚信奉神山生物的藏民。

但是倒退十几年,要是聊起三江源,对方或许一脸茫然,或许会提到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提到里面壮烈牺牲的反盗猎战士索南达杰,提到里面布满荒原的藏羚羊尸体。

索南达杰的牺牲像是一把火,点燃了30年的三江源保护:外来的摄影师杨欣从此扎根三江源,靠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民间保护站;索南达杰的秘书扎多跟着杨欣,建起了青藏高原第一个民间NGO,拉着当地牧民的手保护自己的神山圣湖;他们的后辈,80后的阿旺,出国留学又回到故乡,带着国际NGO的经验与新生的锐气,把保护工作玩出了花。

杨欣:汇集五湖四海的力量

以1994年为界限,杨欣的人生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

1994年之前,他是年轻锐气的探险家,他曾经漂流了整条长江,拍到至今为止长江漂流最精彩的一张照片。

1994年之后,他是环保家,他留在了三江源,打算用余生保护这片高原上无数的美丽生灵。

多年的考察和拍摄让他发现长江源已不再是生物的天堂,站在沱沱河源头的冰川



杨欣

前,他只能看到升高的雪线和退缩的冰川,还有遍地的冰渍物和孤零零的冰塔。1986年他在通天河畔看到的绵延的草坡,到1994年已经变成了荒芜的沙丘。冰川在退化、动物被捕杀、草场在荒芜,索南达杰的牺牲像一个警钟敲在他头上,他得做点什么。

于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赶赴可可西里,七手八脚地建起了索南达杰保护站。以保护站为据点,大家跑遍了可可西里监测藏羚羊和雪豹。也是他们,在2001年至2003年期间,沿昆仑山口到五道梁之间100公里的青藏铁路施工沿线进行了139次调查,取得1400多组数据,完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2002年8月,“绿色江河”志愿者们完成了《关于为保证藏羚羊顺利迁徙急需采取措施的建议书》,建议书下午5点提交,晚上8点铁路施工单位就回复了红头文件《关于采取紧急措施确保藏羚羊顺利迁徙的通知》,提出每天停工两小时以便藏羚羊迁徙。

“十几年来,大浪淘沙,剩下三百个志愿者,但是个个有用。”杨欣对于“绿色江河”培养的志愿者团队骄傲得不得了,他也确实有傲气的资本。20年来来往“绿色江河”的明星志愿者数不胜数,很多年轻人热爱的“苏哥哥”每年都会去找杨欣报到,现在如果想要报名成为冬季的驻站志愿者,需要层层面试选拔,难度赶得上2020年的秋招。“绿色江河”五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优秀的志愿者管理机制回回都是亮点。

除了志愿者,还有陌生人。

将索南达杰保护站交由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之后,杨欣回到了沱沱河,经过八年

的调查,发现长江源头,甚至整个青藏高原,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垃圾问题。“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从此多了一项任务,他们去草原,去牧区告诉老百姓,这些瓶瓶罐罐如果你乱扔,草原的草就长不好,牛羊吃了会生病。瓶子如果烧了会有有毒的气体,呼吸以后会生病。志愿者教他们垃圾分类,分了类以后把垃圾带到保护站来,带来10个矿泉水瓶子,我们就给你一瓶矿泉水,十个方便面盒子可以换一盒方便面,10节废电池换4节新电池。就是这样,食品换物品,把草原的垃圾置换在保护站,志愿者来消毒打包。

因为保护站建得很漂亮,很多游客来了以后都愿意带走一袋垃圾,只要运出420公里,到了格尔木那个地方。但是光游客带是不够的,杨欣发现整个青藏公路的货运呈单向运输,物资进去以后70%的返程车是空的,返空车辆的运价就要低得多了,所以从2016年开始,“绿色江河”尝试在青藏公路沿线建立集垃圾回收、司机休息、公众教育为一体的绿色驿站,大量的车队开始将整个青藏高原的垃圾一点点搬到格尔木。**2018年,他们带走了10万件垃圾。**

2014年“绿色江河”第三次获奖时,评审评价他们:“2001年**“绿色江河”**获“福特汽车环保奖”大奖后,十几年来他们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长期坚持组织志愿者进行监测和社区环境教育,继可可西里保护站以后,又筹资建起长江源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区。”而这一年的奖金,后来也被用来修缮长江源保护站,提供生活设施、水处理设备、太阳能发电设备、车辆及大气、气象、水质监测设备、通讯设备等,为150名志愿者和专家开展项目提供后勤保障。

杨欣说,中国人热爱的山水是青山绿水,能够看到长江源头清澈的河流和碧绿的河滩,这就是他20年前创立“绿色江河”时的愿景。这条路,“福特汽车环保奖”与他一起走了二十年,也将继续走下去。



“绿色江河”长江源生态拯救行动

扎多：藏区本土文化的力量

哈希·扎西多杰，人称扎多，但凡要讲三江源的故事，扎多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传奇。他是索南达杰的秘书，是最初从事藏羚羊保护的先驱之一，是青藏高原第一个本土民间环保组织的创始人，从他的身边走出了继续投身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无数人。

但是他自己，总是说自己还是那个游牧人家的孩子。



哈希·扎西多杰

索南达杰去世后，扎多离开了野牦牛队，但可可西里的故事让他再也放不下生命和环境的保护，当他回到他和索南达杰的家乡索加，接棒成为索加乡党委书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单纯做一个公务员，总是想要再多做一点。

索加的面积非常大，整个可可西里都在索加的范围内，全境分布了像藏羚羊、雪豹、藏野驴、黑颈鹤这样的珍稀、濒危并特有的野生动物，而且种群比较大。围绕每个村落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物种或者生态系统，扎西和他的伙伴在索加设立了五个保护地，比如君曲村藏野驴保护地，“君”的意思其实就是藏野驴，所以那里又叫“藏野驴村”。在国内，甚至可能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个有这么多藏野驴的地方，当地的牧民其实对藏野驴有很深的情感羁绊，在一分钱补助都没有的情况下，保护工作基本就是靠着情感链接维持的。

4个村落的16位生产队长担任起了生态监测的任务，放牧的同时拿着扎西发给他们的表格，记录自己村子保护的动物的活动痕迹、生活范围。曲村和牙曲村当地老百姓甚至花钱买水泥做了保护警示标牌，以当时条件来看，索加连公路都不通，各家各户连房子都盖不起来，而他们却用自己的钱买水泥建这个标牌。扎多说：“他们真的是花血本钱在做这个事情。”

20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保护方法叫社区共管,叫协议保护,让居住在保护地里面的村民同时担负起生态保护的职责,但是在1999年的藏区,这是最初的尝试。2002年,索加的项目还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提名奖。离开索加之后的20年,扎多依旧希望创造更多的“索加”,三江源近40万平方公里,环保组织来了又走,不变的是扎根在这里的牧民,直面野生动物和环境考验的,也是这里的牧民。

“时间越久,我越相信牧民本身的力量,相信草原本身的物种。”

20多年走在公益环保的路上,扎多曾经相信孤胆英雄式的付出,后来相信国际组织的科学与严谨,现在相信社区主导的力量。“福特汽车环保奖”一直陪伴着他,从学校推广环境教育课程,到整个三江源培育民间环保人。扎多年轻的时候总是有人跑来跟他说,有本事的人都去挣钱了,没本事的人才做公益,但是拿着奖项,拿着奖金,拿着社会的认可,扎多的腰杆总是要硬一点。

但是不够,还是不够。

没有牧民了!

2020年了,年轻人进城打工也好、做公务员也好,只要去了就不会再想回来。等父辈老去,三江源可能没有游牧人家了。

没有了牧民的草场和生物变好了吗?

好像也就那样。

千百年的游牧已经和青藏高原形成了默契,是扎多无比怀念的过去。

2018年离开“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之后,扎多发起了自己的项目“卓巴仓”。藏族游牧人家的牧民自称为“卓巴”,草原上一顶顶黑色的牦牛帐篷就称之为:“卓巴仓”。“卓巴仓”希望找到108个年轻人,建立108个长江牧场,在牧场里恢复传统牧民饮食和游牧活动,并且将游牧产品融合进市场供应,探索游牧文化与当下社会融合的模式。

现在长江一号牧场已经建起来了。牧场主人索巴原来是西北民族大学的辅导员,2018年参与了扎多组织的水祭祀活动后,辞去工作回到了家乡治多,重新经营起了爷爷奶奶废弃的牧场。他翻修了废弃的房子,重新搞了一批牛羊,接回了爷爷奶奶,放下电脑骑上马,经营起了自己的牧场。

2019年开始,索巴动员他的家人在牧场所在的周边开始定期进行动植物生态监测活动,也开始对当地牧民分享生态牧场的运营经验。此外,“卓巴仓”的生态旅游也在热闹

地开展中。在2020年最新的一期中，他们将带着游客体验牧民传统的转场，游客将协助他们把牛羊从深山的夏牧场赶回山外的秋季牧场，骑马也好骑摩托也好，干活为主体体验为辅，但是就是这样劳作付出，才能体验到游牧文化的真谛呀。

从家乡索加的社区协议保护，走到整个玉树州的环境教育，再走出玉树到青海全境环保人的培养，再从整个青海的人才网络回到一个小小长江牧场的经营，扎多终于化繁为简，找到了让信仰和保护完美融合的解决之道。

这个游牧人家的孩子，终于在草原上找到了自己的“卓巴仓”。

阿旺久美：后生可畏

2014年阿旺久美从英国肯特大学毕业后，原本想继续研究生阶段的课题，继续研究藏区的传统文化、宗教为什么可以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FFI（野生动植物国际）在青海的项目主管又来坚持不懈地忽悠他回到保护工作一线。确实，像阿旺这样精通英语、汉语、藏语三门语言，接受过系统的生态学教育，有过保护工作经验，同时对本土文化有深厚了解的藏族小伙，整个三江源也找不出来几个。

阿旺确实也把保护工作玩出了花样。

和扎多老师一样，阿旺也深深相信三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一定离不开神山圣湖崇拜的内核。但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感受到了口口相传的故事在当代文化语境里的格格不入。所以在FFI工作的第三年，阿旺和伙伴们搞了点新的：他们攒了一群当红的藏语歌手，录制了DVD专辑《草原母亲的呼唤》专辑里有20多首歌，传统的唱腔和曲调，伴随着现代的编曲和电吉他，讲述的依旧是老故事，呼吁的还是保护和爱惜养育藏人的草地、河流和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但是MV拍的是当红歌手，俊男美女身着藏袍，奔跑在干涸的河道里，回忆里是神山脚下翠绿的草原。

“当时大家都听DVD的，我们这个专辑特别火，除了青海，云南、西藏、四川的藏区年轻人都在听的。”阿旺聊起来在FFI期间的工作，最骄傲的就是这张专辑。对于长期处于主流汉文化的汉族人来说，用流行音乐讲述传统故事并不少见，但是对少数民族来说，现代编曲的母语讲自己民族的故事，有天然的亲切感。阿旺和他的伙伴们还把中英文中生态保护相关的专业术语与基础理论翻译成了藏语，邀请藏族明星拍摄环保科普视频，在电视上进行播放。

阿旺所接受的专业生态学教育，终于在三江源扎下了根。2016年FFI的“原上草”

项目完成以后，阿旺和伙伴将“原上草”注册为独立的机构。当时的原因很简单，先前培育的社区环保组织还是需要生态学与环保的专业支持，FFI这条大腿走了，那就自己做大腿。

自己创立机构确实难，不光没钱没人，更怕没目标没方向。在FFI的时候，总部的愿景与使命虽然有时掣肘，但确实奠定了项目的根基，脱离开国际背景的“原上草”，该关注什么呢？

阿旺当时跑到北京和各路专家、老师商量了整整一周，总算理出一个“曲线救国”的头绪：**从文化和生态重要性都非常高的阿尼玛卿雪山的雪豹入手。**

一开始，阿旺只有北大的李晟老师捐赠的10台红外相机，要让这些相机抓到雪豹的照片，摆放地点要慎之又慎。第一次摆放红外相机的那天，果洛已经连着下了好多天的大雪，阿旺和伙伴们趟着没过大腿的积雪，在严寒中爬上了近5000米的山峰。顶着极度的低温，缓慢呼吸着稀薄的氧气，他们艰难地从陡峭的山壁和山崖间的怪石中，辨识出雪豹活动的痕迹。凭借着这些足迹、粪便、尿迹、刨痕、气味标记、捕食残余等，他们放下了得来不易的红外相机。

放完红外相机当然还要收，一样要反复爬上5000米的高山。要出门就又要开车，当时其实是“原上草”最困难的时候，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车要么是伙伴华青的一辆好小好小的“蛋蛋车”，遇到陡坡就“吭哧吭哧”地抛锚，要么就是花高昂的费用租车。开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下车步行，继续爬山、缺氧、休息、再爬山的循环，直到取回相机，像开彩票一样看看有没有拍到雪豹。



阿旺是幸运的，四个月之后，雪豹出现在了他们的镜头里。

阿尼玛卿山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关注，他们的故事上了央视新闻联播，之后又在各大媒体上进行多次曝光。“原上草”由此对整个阿尼玛卿山的雪豹种群进行了全面调查

和估算,又培养了当地的牧民使用红外相机进行持续监测。2018年,阿旺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15万元的非限定性奖金用来买了一台越野车,一台不会抛锚,不用推车,到现在还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越野车。

访谈阿旺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聊到很多次关于藏文化与环保之间的关系,80后的他依旧深深热爱与信仰着传统文化,同时也希望传统的形式与精髓可以和环保科学形成新的结合与平衡。十几年来来的各种尝试,从DVD,到雪豹监测,到水祭祀的复兴,阿旺看到了藏区环保的更多玩法与可能性,也更加期待三江源保护的未來。

在《可可西里》的影评里有这样一条可爱的提问：“我想知道现在这些藏羚羊还是这么可怜吗？”，下面有一条更加可爱的回复：“很多人在这里做了很久的努力,现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保护区,这些藏羚羊过得很好。”

我们只讲了这“很多人”之中的三个,在访谈的过程中,扎多老师曾经提到杨欣老师,说他们“这二十年没完没了地在一起”,抱着对三江源的挚爱,他们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却殊途同归的道路。阿旺作为新一代的环保人,在前辈探索出的文化与社区融合保护方法基础之上,带着国际组织的经验与年轻人的锐气继续向前。“福特汽车环保奖”陪伴着这三位一路的历程,也见证着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不断演进与发展,走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范式。

这一路有你,何其有幸。

获奖故事

- 杨欣创立的组织绿色江河多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2001年,“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系列行动”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项目一等奖;2004年,“青藏铁路沿线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项目三等奖;2010年,“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项目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低碳生活文明类三等奖;2014年,“长江源生态拯救行动”项目获“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一等奖;2017年,绿色江河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先锋奖。
- 哈希·扎西多杰,人称扎多,带领他创立的组织与项目多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2002年凭借青藏高原索加地区“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获自然环境提名奖;2007年凭借“‘绿色摇篮’环境教育项目”获环境教育三等奖;2015年凭借“三江源基层环境组织发展项目”获得先锋奖二等奖。
- 阿旺久美为青海省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的创始人兼负责人,该机构于2018年获“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先锋奖。

传递一颗爱自然的心 ——赖芸、赖寒、汪永晨

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地铁里的广告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公益内容,可能是呼吁大家抵制象牙制品,可能是号召潜水员加入珊瑚礁保护,从投放位置、明星资源到版面设计,与一般的商业广告不分伯仲,大家也常常驻足。

但是倒退 20 年,这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事情。环保领域的公众教育方式经历了漫长的迭代,从最开始的口号式呼吁,到后来媒体资源的介入,再到后来沉浸式的自然教育、参与式生态环境营造、专业化的媒体营销等方式的出现,中间是无数伙伴的探索和努力。“福特汽车环保奖”20 年的伙伴中,有一多半都深耕在环境教育、自然教育领域,他们有的推动了一个新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有的长情深耕小而美的活动,但共同的内核都是希望传播爱自然的那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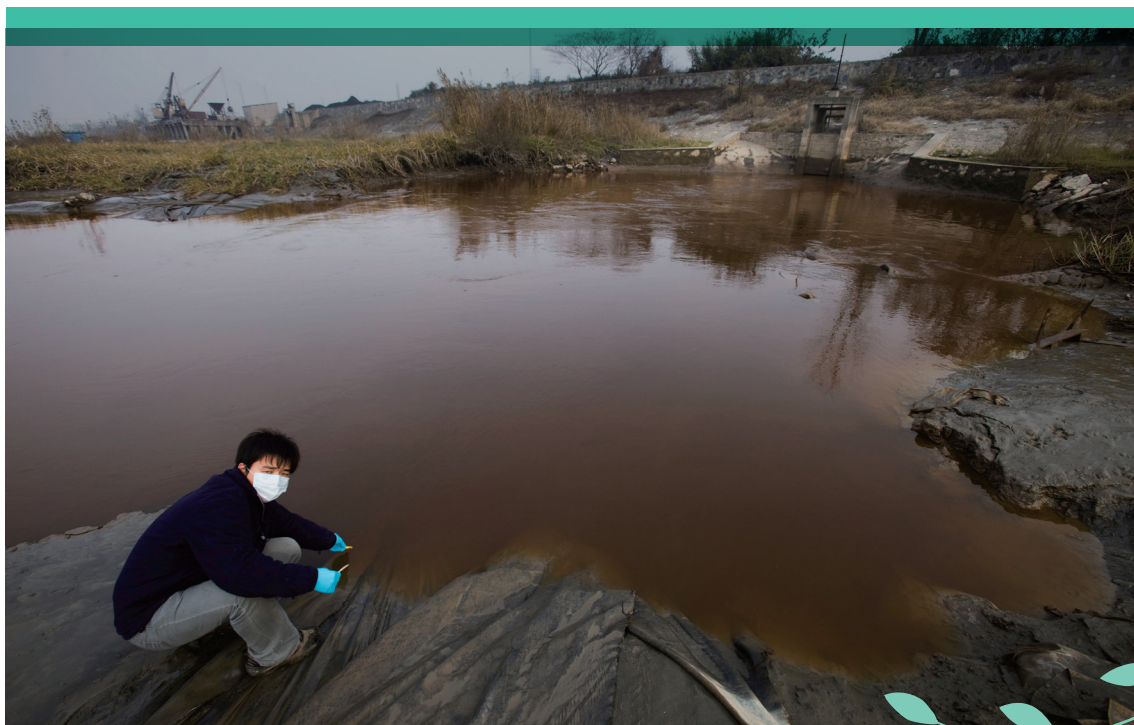
赖芸：大自然的温柔革命

从 2000 年跟着“大学生绿色营”远赴新疆算起,赖芸在环保行业已经待了 20 年,但是说实话,开头的几年是有点无奈的。

他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去了北京麋鹿苑生态实验中心,从事科普讲解工作。这是一份喜忧参半的工作,给学生讲麋鹿的沧桑史、在中国本土灭绝又重引入的故事是幸福的,孩子们像一块海绵吸收着一切信息,但是给成年人讲解保护环境的时候,赖芸却又常常碰壁。那时候成年人对环保的理解,常常局限在不要摘花踩草,不要乱扔垃圾,更是暗含一种对立情绪,觉得环保是有钱之后才做的事,“连温饱、小康都没解决,谈什么环保”。

社会阅历不深,经历有限,沟通不易,赖芸常常感到很无奈,也很无力。

赖芸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国际环保组织从事一线污染调研，直面工业污染、废水废气，但是调研曝光带来的舆论就像一阵风，轰轰烈烈的刮过就没了下文，污染企业今天不开明天开，白天不排夜晚偷排，这里被处罚了就换个地方继续。很多环境污染事件的整改，并不是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公众面对环境污染报道，也开始变得更为麻木，见怪不怪了。而污染受害者们能搬走的都搬走了，留下的则继续饱受着环境污染给身体带来的伤害和煎熬，慢慢地也变得绝望了。赖芸开始觉得，末端治理的环保思路，治标不治本，还是要向上溯源。



进行污染调研的赖芸

为什么有的人对大自然就有着天然、深沉地爱，但是有的人就能毫无情感，肆意破坏？他想到自己在乡下度过的童年，小时候与萤火虫、大山、溪流为伴，不需要别人对他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他也从未想过自然与他无关。也许环境的破坏，对环保的不解，都源于儿时对自然的缺失。

2013年，赖芸创立了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以下简称“鸟兽虫木”)，开始了对自然教育的探索。与以授课、喊口号为主的传统环境教育不同，自然教育强调在自然中，全身心投入大自然进行体验与学习，与自然生命互动，通过课程设计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理念与知识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们。

赖芸带着孩子们去印度的国家公园看老虎。很多人会觉得动物园里也有老虎，何必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去看。但赖芸认为，这区别在于，那里的老虎是野生的种群，让大家看到野生老虎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并得以生生不息、自由繁衍。只有当孩子们看到真实的野生老虎栖息地里，森林面积是如此广阔、环境是如此多样，物种是如此丰

富,他们才会理解到为什么老虎这样的顶级猫科动物能够标志着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健康与否,理解保护老虎及保护其栖息地的重要性。当孩子们在森林里,有机会听到孔雀、斑鹿、水鹿、猴子们在森林里,相互帮忙的关系,用各自的方式在警告并宣布“老虎来了!”,他们才会亲身体会到自然界中物种之间的关系,体会到自然生命的神奇,体会到大自然的伟大。

在这种背景下,赖芸会再给孩子们讲述中国老虎的现状与危机。由于中国人对虎骨、虎皮的盲目追求,滋生了近乎猖狂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原本中国是老虎种类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新疆虎已经灭绝,华南虎近乎野外灭绝,东北虎都躲到了俄罗斯境内。

这样的触动,很难不内化成行动和改变。赖芸总是很骄傲的分享,有一年跟着他去印度的几个孩子回来之后,一起组织公众演讲活动,去讲《保护大猫》,介绍印度人如何保护老虎,去呼吁让更多人不要吃野生动物。有几个孩子之后还继续在班里或者学校里分享他们在印度追踪老虎的经历,呼吁保护野生动物。一个自然教育活动,如果能从内心影响到孩子们,不仅增加他们的知识、提升他们的意识,还能转化成改变自己,甚至影响他人的行动力,这就达到我们自然教育的目的了。



把孩子送到“鸟兽虫木”参加活动的家长越来越多,2013年到2018年六年时间,“鸟兽虫木”通过自然讲堂影响的人次由1000多涨到5000多,全职人员也由最开始的2个人快速发展到10多人的团队。2017年“鸟兽虫木”在发展的鼎盛时期第一次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15万元的奖金也投入了新伙伴的招募和团队发展上,到2019年,加上核心志愿者“鸟兽虫木”已经有了近四十人的团队。

但赖芸想做的，不仅仅是“鸟兽虫木”一家机构，他希望开拓的，是推动整个自然教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开始，赖芸参与发起了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六届论坛见证了自然教育的井喷式快速发展，从第一年的250名参会者，到2019年1300多人参加，翻了整整五倍。赖芸理想中的自然教育市场，是由商业机构、非营利机构、专业环保机构、自然保护区、相关产业交错构成，多种参与方构成完整的市场生态。“不过还有蛮长的路要走”，2018年的华南地区自然教育论坛中，赖芸把参加论坛活动的旅行社、保险行业、户外行业等相关方邀请来参与讨论，“大家话语体系不同，理解不同，有点鸡同鸭讲的意思”，但是坐在一起交流、探讨，就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2020年的新冠疫情还是给自然教育发展的好势头按下了暂停键。根据全国自然教育网络2020年2月的最新调查，全国的自然教育机构现金流紧张，74%的机构账上余额撑不过半年。2020年的前六个月，鸟兽虫木就靠着2019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15万元奖金，加上全员减薪40%才撑下来，好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鸟兽的户外自然教育活动5月就重新启动，加上暑假的营期，“又续了半年的命”。

赖芸常说自然教育是“大自然的温柔革命”，行业发展要一步步来，孩子们的转变也要慢慢走。

总之，未来始终可期。

“喜鹊婆婆”：勇敢去追求真善美

赖寒已经很习惯别人称呼她为“喜鹊婆婆”，这是她最初参与自然之友活动时起的自然名。喜鹊是北京最常见的鸟类之一，她又较为年长，“喜鹊婆婆”很容易就被大家记住了，而在类似这样自然名的背后，蕴含着自然界里众生平等、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念。

“喜鹊婆婆”住在北京北部，和鸟巢、水立方都属于清河流域。和现在不同，清河曾经就是一条臭河，与大多数都市人一样，“喜鹊婆婆”对于那样的脏乱环境，曾经的第一反应就是避开和抱怨，但其实对它也知之甚少。直到有一天，她听说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坚持守护这条河已经两三年时间，她才幡然醒悟，其实自己也是清河的居民，应该为身边的河流、身边的环境做一点什么。

于是，“喜鹊婆婆”加入了自然之友公众参与行动，一开始只是一起走河，然后就开始采水样、测水质、打电话举报非法排污，也参与调研清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再后来，他们组建了清河公益导览团队，在600岁古桥广济桥前、在奥运园区的龙形水系边，以及

清河古今源头处,向周边的社区居民和外企员工、老人孩子亲子家庭,讲解清河的花草、树木、鱼虫和天空中的飞鸟,向大家介绍“清河的居民不只是咱们人类”、“为什么清河的污染治理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听过他们的讲解,越来越多的人走近了身边的河流,加入了河流守护的队伍,成为了清河有缘人。澳大利亚的环保摄影家迈克在各地举办讲座,在他全球演讲的PPT里面,唯一的一个中国面孔,就是她——“喜鹊婆婆”在清河带领孩子们检测水质。

这是“喜鹊婆婆”接触环保的缘起,也是她在2017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终审答辩的现场代表自然之友分享的内容。“福特汽车环保奖”20年,代表机构站在讲台上的通常都是创始人或者负责人,“喜鹊婆婆”作为志愿者分享的故事反而格外温暖新鲜。

也正是在这次终审答辩之后,“喜鹊婆婆”开始涉足公众参与式生态营造,逐渐由一位志愿者向专业环保人转变。喜鹊婆婆虽然并不是设计专业出身,但是她坚信只要拥有一颗热爱自然、爱人如己的心,人人都可以营造出自然友好的小角落。由专业人士和空间使用者、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响应的参与式生态营造就是这样的过程。

“喜鹊婆婆”最近参与的一个社区营造的案例就在宇宙的中心---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的富润社区,为儿童友好社区的营建提供顾问指导。儿童友好社区的概念听起来有些抽象,但是回想起小时候,从放学到家门口的路上,一路招呼打不停;放学后和院子里的小朋友每天玩得脏兮兮,走家串户笑不停;晚饭时,家家飘出饭菜香,爸妈催促再回家。像这样在睦邻友好的气氛中结伴玩耍、在自然环境中摸爬滚打,是在水泥森林中长大的小朋友所未拥有过的。而空间友好、服务友好、文化友好,正是儿童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润社区是北京两个入选中国儿童友好社区首批试点社区之一,第一个开工的项目是儿童友好(生态)花园。原先社区内儿童活动空间严重不足、缺乏适宜的游乐设施与家长休憩设施,绿化植物严重退化,贫瘠土壤四处裸露;旱溪积水严重、蚊虫滋生;沙坑更是直接硬化成光秃秃的地面。项目团队首先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和建议、推进达成治理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了亲自然的改建设计。除了规划出清洁沙土填充的挖土区外,周边还设置孩子们可以动手操作的装置,再搭配上四时有景、三季花相的乡土植物栽培,结合土壤复育和昆虫栖息地的营造,创设出充满乐趣与野趣、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场景。与一般小区内硬质地面和硬塑大型健身器材不同,主要采用木质、竹制等自然材料,并且采用柔软铺装提升安全舒适度。昔日被人厌弃的绿化边角地带终于焕然一新,成为孩子们自在探索自然与艺术奥秘的友善空间。



孩子参与植物认知和自然笔记活动

和通常的专业施工作业不同，“喜鹊婆婆”和团队伙伴们组织社区老少居民、党团员、社会志愿者和各领域的社区营造专家共同参与营造，先后制作了蚯蚓塔、昆虫屋、引鸟屋和标识牌等。而且，区别以往的公众营造活动，他们特别重视创造儿童参与的机会——孩子们在建成后的花园内开展植物认知和自然笔记活动(如上图)——“叶子对对碰”游戏引导他们观察植物形态，通过对比“花园植物卡”和动手完成自然笔记，花园中的植物变得越来越熟悉亲近。

“喜鹊婆婆”说，从2016年开始参与河流守护行动、2017年“福特汽车环保奖”活动，她经历着一个自我不断生长的过程、一个将工作和生活有序地融合到一起的过程，在寻求与自然、与公众和谐相处的同时，也帮助自己不断建立完善内在的协调与平衡。随着她在志愿服务和工作中的积累，生活的秩序在自然的整体系统中不断重构，对“简单富足”的理解更加笃定，“晴朗澄明”从可能变成现实，真切体会到在身边、在自然中更多美好事物的存在，工作生活中也总是充满了欣喜。

汪永晨：我走在大江大河

如果沿着“福特汽车环保奖”历年获奖的伙伴看下来，会发现90年代就开始做环保的老师，很多都是媒体、艺术出身，“绿色江河”的杨欣是这样，“绿家园”的汪永晨也是这样。

也许是记者天然的要具有同理心，也许是见多了残酷的现实，当时还是广播记者的汪永晨，从80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期与环境有关的节目，例如1999年制作的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失的冰川——寄自长江源的家书》、2001年制作的广播特写《百岁老人和她的渡口》。那是传统媒体报道的黄金时代啊，记者是真相的传播者，严肃报道会引发严

肃的探讨,一个热爱环境的记者自己就可以引发不小的反响。

那如果所有的记者都是这样呢?

2000年开始,汪永晨发起了绿色记者沙龙,一做就是20年。他们每月请一位专家给那些没有生态学背景的记者解读环境热点事件,以避免在日后的报道工作中犯常识性的错误。第一期环境记者沙龙讲的就是洪水,1997年的洪水让人心有余悸,都认为洪水是天灾,但是汪永晨请到的专家说,洪水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形态,而且就是因为有洪水才有了肥沃的土地,尼罗河就是因为洪水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丰饶的平原。

2020年的我们也许习惯了资讯的发达与交流的快捷,但是回望二十世纪初,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能够给最有话语权的记者以专业知识和交流平台,环境记者沙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也因此获得了2004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8万元奖金都用来支持了后续的环境记者沙龙,给义务来讲课的专家报销一下路费和食宿,支付一下场地费,用钱的地方不多,倒也陆陆续续的用了蛮久。

不光是2004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奖金,汪永晨和她创立的“绿家园”一共三次获奖,奖金都被用在项目的志愿者补贴上,这其实起源于汪永晨的一点“私心”。在业内做了20多年,汪永晨看到很多专业组织做得很大,有了稳定的全职团队和办公场地,完备的筹款战略,她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就是看着很累”。24年过去了,“绿家园”依然没有全职人员,100多个核心成员全都是志愿者,每周的北京乐水行里,作讲解的专家是志愿者,参与走水的也是志愿者,有学生,有白领,有京郊的农民,松散但自由的组织形式让他们一直走了十几年。

汪永晨做项目都非常长情,环境记者沙龙一做就是20年,“江河十年行”也从2006年开始做了远不止十年。中国水电开发的大潮之下,汪永晨带着媒体人沿着长江、黄河、怒江走了十几年,书写了好多本,就讲受影响最大的江边人家的故事。汪永晨曾经在一次环境记者沙龙上分享过一个江河十年性定点采访的案例,是一个原本住在黄河与渭河交汇处的唱秦腔老人。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的时候给她搬了一次家,然后三门峡水库修的时候给她们搬迁了一次,河边旅游开发又被搬了一次。最后一次搬迁的时候征收了她河边院子里很大的一片地,原本她靠着在地里种点菜生活,院子收了补偿的30万元全给了儿子,儿子儿媳一分钱都不给她留,她只能自己租一个院子,女儿再贴补她一点。她从小唱秦腔,我们十年定点采访除了2010年太晚了没唱成,她给我们在河边唱了九年。她的一生被搬了一次又一次,虽然没有怨言,但是一年年的秦腔唱起来,我们听得出来,是越来越无奈的。”

大潮之下弱势群体的声音往往微不可闻，“江河十年行”起码提供每年一次机会，可以让江边人家的故事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北京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以及《中国经济时报》、《新京报》等平面媒体的新闻版块，传递给更多的读者。

汪永晨喜欢形容“绿家园”的工作方式是“死磕”，早年参与叫停怒江水电站建设是这样，如今坚持走水也是这样，懒得找钱的时候直接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也是这样。别人给她罩上了悲剧式的英雄主义头衔，但她自己其实自得其乐得很。



汪永晨

“以前我最爱的是做记者，这件事情我一直做到了退休。现在我最爱的事情是走水、保护环境，我打算一直做下去。人一辈子不长，总是要活出自我，这一点我做的还挺不错。”

访谈之中三位老师都提到，疫情和缓之后他们的活动全部爆满，其实普通人比他们以为的更需要自然，不仅是小朋友需要摸摸草闻闻花，在钢铁丛林里通勤的成年人更需要与脚下的土地建立真实的连接。“福特汽车环保奖”的伙伴们已经用20年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玩法，不如大家一起来试试？

获奖故事

- 赖芸创立的组织鸟兽虫木分别于2017年与2019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先锋奖。
- 赖寒在2017年代表自然之友参与“福特汽车环保奖”现场答辩。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曾五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分别是2001年的环境教育三等奖、2011年的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三等奖(自然之友低碳家庭议题)和提名奖(运用法律手段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完整性)、2015年传播奖一等奖(大气污染公众行动倡导)和2017年的年度先锋奖。
- 汪永晨及其所建立的绿家园志愿者获得过三次“福特汽车环保奖”，分别是2001年的环境教育三等奖(北京“绿家园”志愿者项目)、2004年的环境教育二等奖(环境记者沙龙)和2012年的传播奖二等奖(“乐水行”项目)。

那人那树那一生 ——吴向荣、郑乃员

人和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树从生到死，就扎根在这里，而人会成长、会改变、会远离。但神奇的是，有些树、有些地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让人兜兜转转无法离开。而有些人，即使远走他乡，最后还是回到儿时的树下，守护着这一方土地。

远渡日本又回到阿拉善种树的吴向荣是这样的人，30载义务守护家乡红豆杉的郑乃员也是这样的人。

吴向荣：种树植心

印象中北方春天的风是有点涩的，刮在脸上和手上会有颗粒颗粒的磨砂感，如果在沙尘暴起的日子在路上骑车，会迎面碰到纱巾蒙面、捂得严严实实的阿姨。早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否则晚上回来看起来桌子干干净净，但是手指一抹就是一层土灰，如果是刚刚洗过手去摸，那就是一层泥。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春天的沙尘暴好像变少了，那样遮天蔽日飞沙走石的日子，好像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了。

是因为有人在远方默默地努力呀。

阿拉善位于内蒙古的最西部，面积比广东还大，却只有22万人口，绝对是地广人稀，没人的地方都被沙漠和戈壁所占据。那里历来干旱缺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阿拉善的沙漠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贯穿全盟的三大沙漠连为一体，几乎不可逆转，阿拉善也因此成为了历次沙尘暴的重要源头。

吴向荣就生长在这个黄沙漫天的地方。18岁的时候，治了一辈子沙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日本，希望他能走出沙漠，但是他在日本读了环境学，读了经济学，最终还是在2003年回到了阿拉善，发起了腾格里沙漠锁边项目，接棒父亲继续治沙。

很多人听到治沙,都觉得是要把沙漠全部消灭变成绿洲,实则不然,“我们要治理的不是沙漠,而是沙漠化。”吴向荣说。过去的沙漠周边是大量灌木和草本木构成的荒漠草原,再向外是湖泊和绿洲。水源和植被会把沙漠锁在原地,不让沙漠越来越大。近些年由于农业开发,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湖泊和绿洲随之消失,过度放牧又导致草场无法恢复,沙漠这才开始快速扩张。“我们因此提出了‘锁边’这个概念,就像做衣服时把边上的布锁住,防止线头抽开,我们沿着沙漠边缘造林,用植被做防护带,阻止沙漠进一步扩张。”

防护林里面种植的并不是树,而是各种沙漠里原生的灌木,有开着小红花、被当地人称作“沙漠姑娘”的花棒,有根系能扎开直径25米的沙拐枣,还有大家在“蚂蚁森林”里种的梭梭。灌木种下去容易,第一年能抽叶却难,三年五年没有人工浇灌,可以自然存活成林更难。为了提升存活率,吴向荣和他的团队采用了滴灌节水、灌木容器育苗、开沟造林、钎插造林以及采种育苗等相关技术。存活率普遍为50%左右的花棒,在吴向荣手下就有百分之七八十都能成活。截至2019年,吴向荣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腾格里沙漠东缘建立了一条长20公里近3万亩的绿色屏障。



吴向荣

除了种树,还要植心。2011年吴向荣的团队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时,就已经建立了1000平米的公众教育基地,九年间锁边生态基地的生态体验不断完善,每年都会接待大量合作企业、亲子家庭、甚至明星后援会的粉丝。2020年“福特汽车环保奖”20周年记行就回到了锁边生态基地,福特车主走进浩瀚无边的腾格里沙漠,远离车水马龙城市的嘈杂,听吴向荣老师讲授生态课堂,亲手扎下防风固沙的草方格,与自己的内心来一场心灵对话。触摸自己的内心世界,感悟生命,重铸精神。

为了实现基地的自我造血,也是为了不负沙漠的绝佳气候,近几年吴向荣和他的团队开始开发生态农产品。沙漠早晚温差大,是天然的优质葡萄产区,然而高温、干旱、缺水、严寒、早霜等等严苛的自然条件,却也让种葡萄树变得格外艰难。一年又一年,挖苗、上架、打头、摘芯、修剪、埋土……终于在2018年,种出了满意的产量,产出了基地品牌的葡萄酒。基地来来往往的进行生态体验的客人,成了葡萄酒的活广告,慢慢打开了局面。

今年已经是吴向荣扎根锁边生态基地的第16个年头,因为每年在植树,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每年只有冬天能回去一段时间陪一陪她。但女儿依旧骄傲地对大家说:“我的爸爸在种树。他种了很多树。”吴向荣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早知道这个事情需要做这么多年,我早就放弃了”,但是一年又一年,他离开了吗?

他还在这里。

郑乃员：竭尽全力保护那片红豆杉

如果有机会去到江西修水,你可以见到中国保存的最完好、树龄最大、种群个体数量最多的南方红豆杉群落。站在油岭大山深处可以看到参天古树、茂密森林、清澈溪水、层层梯田、龙船湖和第四纪冰川遗迹生命共同体,还可看到硕大无比的枫香、石楠、女贞以及千年南方红豆杉古树群落。

红豆杉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果实富含紫杉醇、蛋白质和钙、磷、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是天然的抗氧化(抗衰老)植物,被人们称为“植物大熊猫”。也正是因为红豆杉拥有珍贵的药学价值,民间开始流传浸泡红豆杉树皮、果实可治疗癌症的说法,如果有人看见野生红豆杉树,就要上去摘点果实、剥层树皮带回家。

换句话说,如果油岭的红豆杉无人看护,早在十年前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已经被砍伐殆尽,根本看不到拥有女贞、石楠、枫香古树伴生而保护完好、具有科学价值的红豆杉古树群落。

郑乃员就是那个人。



郑乃员

1986年,郑乃员还是修水县黄沙镇油岭行政村的一位民办教师,去九江市进修时,在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太平寰宇记》,书中记载了江西多奇山异石、古木以及砍树而树出血,伐木而伐者亡,斫木制舟而舟不动的大量传说。他不由想起15年前家乡遮天蔽日的红豆杉古树,砍伐下来买给造船厂造船、建房、雕刻、做家具等,现已稀疏破败。眼看又有不少地方将茁壮成长的红豆杉树,被人剥去树皮卖钱,郑乃员不由有些痛心。

“还是要把我们的红豆杉保护起来”,郑乃员这么想,也开始这么做了。之后的三十四年,郑乃员每天都会穿着解放鞋,拎着把柴刀上山转一圈,看看红豆杉有没有被人砍伐,果实有没有被人盗摘,晚上再回到半山腰的家里把资料整理起来。油岭地区有红豆杉分布的大致有2600公顷,共有39个红豆杉古树群落,12万多株红豆杉,每年郑乃员在巡护路上都要穿破好几双解放鞋。

独木毕竟难支,2006年,郑乃员开始组织动员油岭的村民成立修水县黄沙油岭天然红豆杉保护协会,对个体较大的红豆杉进行挂牌保护,并且组成巡逻小分队。现在每次上山,都能有十几个人和郑乃员一起行动,山下的村民即使不上上山巡护,也是郑乃元的“眼线”,如果看到有人带着工具悄悄地进村,还没等他们半夜上山,就会有人通知保护协会的成员,大家会赶赴现场制止盗伐。

2010年,修水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油岭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修水县编委批准修水县油岭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管理站,黄沙镇人民政府任命郑乃员为该管理站站长。总面积为2000公顷,拥有不同年龄的红豆杉树12万多株,日复一日的巡护工作耗时耗力,却也治标不治本。没名没分的一片林子,能够获得的外界支持总是有限,2012年开始,郑乃员树立了第二个目标:将油岭红豆杉晋升为省级保护区,在修水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建一座人与万物共生、共荣、共同保护性植物园,集物种保护基因库,成为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和研学教育为一体的基地。县级保护区的设立在顺利完成,而想要升级为省级保护区却困难重重。

申报省级保护区需要有科学考察报告、总体规划和相关专家论定意见、植被图、位置图和千家万户签订托管协议等材料。修水是国贫县,县镇村无钱投入,请不起专家做科考,郑乃员竭尽全力撸起袖子上,十几年的苦读“速成”,撰写了**《江西油岭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和**《江西油岭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也把自己逼成了半路出家的植物学专家。

写报告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前期邀请专家考察,当下日常进山巡护,日后游客观赏红豆杉,大专院所学生研学等,都离不开山里的路,但是油岭山上只有一条“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的机耕道。这四公里的山路要想硬化成水泥路面,总花费

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郑乃员自己的积蓄全部搭进去还远远不够,“福特汽车环保奖”的10万元尽数投入也还差着。筹款实在困难的郑乃员,选择贷款欠债完成了水泥路面的修建,而贷款还上的日子却还遥遥无期。

但是希望就在不远处了,2019年郑乃员又撰写了完整的《江西油岭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和《江西油岭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6年开始,与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合作在该保护区监测中华穿山甲,经达长达4年时间,于2020年4月份监测发现了中华穿山甲,赢得省内外专家赞扬,国家也出台了整合自然保护区政策,或许今年年底省级保护区就能批下来。修水县油岭植物园的批准手续也在陆续完成,就差临门一脚,并且正在申报九江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从而立之年就开始努力的目标即将要达成,郑乃员既兴奋又淡定。

“党和政府的支持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我的生活就还是在这里,毕竟我的家也在这。”

吴向荣和郑乃员,一北一南,坚守着家门口的这一方林子,一守不知多少年。而他们守的又不光是家乡的风景,是内蒙风沙的第一道防线,是中国红豆杉的宝贵基因。在我们感叹春日天空清丽的时候,在我们未来吃着红豆杉提取的抗癌药物的时候,也请别忘了,在远方的那些人,为了那些树,付出了他们的一生。

获奖故事

- 吴向荣和他的团队在2011年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先锋奖提名奖(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项目)。
- 郑乃员和他的团队凭借三十余年的坚守获得了2015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先锋奖三等奖(30载义务红豆杉守护)。

寻找一片蓝色海洋 ——韩寒、夏嘉祥、刘永龙

从小在内陆地区长大的小孩第一次见到海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很复杂的。

毕竟看了那么多年BBC的海底纪录片、《海上钢琴师》和《舌尖上的中国》，一直幻象的是碧蓝的天空、清透的海水、金黄的沙滩、白色的小贝壳和寄居蟹。所以当他们在没有阳光的时候，海面是灰蒙蒙的。在海底没有办法睁开眼看到鱼群，因为水太混了眼睛睁不开。退潮赶海的时候沙滩上遍布的不是贝壳而是塑料瓶盖，心里落差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大部分人止步于感慨，满怀失望地回到家乡，还有一些人选择留在海边，去寻找、重建梦中的蓝色海洋。

韩寒：寻找可持续渔业的中国答案

你有没有看过远洋渔船捕捞的视频？巨大的滑轮和钢绳拖着几百米长的渔网，密密麻麻挨挨挤挤的鱼被打捞上岸。看着那个景象你甚至会觉得恐怖，海里有多少鱼经得起这么捞，但是又觉得自己杞人忧天，地球70%都是海洋，人类总不会把鱼捞光。

这样的担忧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真实情况是，没人知道。

很多人的人生挚爱——麦当劳鳕鱼汉堡的原材料，顾名思义是鳕鱼。这是一种极为常见，全球产量极大的鱼类，但是1992年的某一天早晨，加拿大东北部新科斯渔场的渔夫一起床，发现海里一条鳕鱼都没有了。一夜之间，整片渔场就空了。海洋渔业耗尽不是大家以为的循序渐进提前预警，而是一夜之间的断崖式下跌。

除了未雨绸缪，采取更负责任的生产、捕捞方式，人类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2010年韩寒进入了国际NGO组织——**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通过推动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采购获得绿色认证的水产品，倒逼生产者采用更有利于环境

的方式养殖或者捕捞。同时她会到鱼塘塘头，跟渔民讲怎样的养殖是负责任的养殖。

工作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韩寒有点沮丧。

她被困在了一个谁都没错，但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尴尬情况里。

如果依照SFP的认证体系和绿色有机的标准来养殖罗非鱼，依照标准排污量和氮磷排放量，倒推回饲料投放量，再倒推回罗非鱼养殖量，就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数值，按照这么养所有的养殖户全部都要亏本。韩寒曾经想代表养殖户去和大型零售商协商，可不可以提高绿色认证的罗非鱼价格，但是SFP作为中立的环保组织，参与议价从根本上违背了组织原则。

到这一步，这就不是养殖户是否缺乏环保意识的问题，而是环境成本由谁支付的问题。一味地强迫养殖户没有道理没有效果，想要议价也没有立场。2015年，韩寒最终决定，还是要成立中国本土的可持续渔业机构，而这也是“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智渔”）的起点。

“最开始，‘智渔’希望从消费端倒逼生产端，推动公众消费环境友好的水产品。”智渔的伙伴在TED演讲中分享“智渔”的方法时聊到，“‘智渔’当时复刻了国外流行的可持续海鲜消费指南那种‘红绿灯’评估体系，即根据海鲜物种生产中是否排放大量污水，是否破坏红树林，是否给其他物种例如海龟、海豚造成危害等数据，进行评分，分数低的水产品被标成红色，就是建议避免消费，否则反之。”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智渔”却发现，中国有关水产品生产和其环境影响的公开可获得的数据少得可怜且几乎无法使用。此外，我们和西方工业化的捕捞养殖很不一样，我们百分之七八十的水产品都是由千家万户十几亩鱼塘虾池的小规模生产者或小型渔民供应的，并没有固定而集中的供应链，所谓的零售商给的压力顶多到了批发商那，批发商面对分散和流动的供应源，并没有太多话语权。”

从终端走不通，那就从源头走，帮助养殖户养出环境友好的水产品。

罗非鱼成了“智渔”的切口。

罗非鱼养殖业其实依旧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养不养得好赚不赚的到钱依靠天时、依靠气温、依靠水依靠运气，唯一可控的部分就是塘主的饲料、增氧机和鱼药。但是2020年了，海南的罗非鱼养殖户基本上还是依靠经验在料理鱼塘，看鱼儿吃得是否卖力来决定该喂多少料，看水的颜色和流动决定是否要打开增氧机，如果有鱼大规模死亡，或者行话叫翻塘，就考虑是不是生病了，下点消炎药。而过多的饲料、过量的抗生素，恰恰

就有可能成为水产品和水体污染的源头。与其说一百遍水体里的氮磷含量不能超标，不如帮助塘主有的放矢。



罗非鱼养殖户

韩寒和她的团队于是扎到了塘头，希望搞出一线养殖户能用的上的智能养植物联网设备与系统。经过一段时间建模与调试，“巡塘宝”APP上线。用“巡塘宝”之前，技术人员们每天要亲自跑遍一个又一个鱼塘，不断地在塘中拉起一网又一网罗非鱼做日常的打样检查。检查时要记录罗非鱼的体长、体重，然后掏出计算器通过公式各种换算，才能得出它们的平均规格和肥满度。用了“巡塘宝”之后，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住在塘边的养殖户直接进行，养殖户只需要把普通的体长体重直接输入进巡塘宝，巡塘宝就能把数据通过内置公式计算成需要的指标，传输到坐在办公室的技术员手上，极大地节约了技术人员和养殖户的时间。

而当我们把镜头拉远，放到整个海南的渔业养殖与捕捞，放到水产生计和生态保护的博弈中来看，就会发现可持续渔业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对于这个难题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答案。

聊完了业务，又和韩寒聊起了自己创立NGO这五年。她说和创业做公司一样，压力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但对自己的认识也在光速成长。虽然面临着经济压力，背负着整个团队的前途和未来，时常还要面临内心对未来方向的质疑，但是韩寒到目前依旧乐在其中。一方面当然因为“智渔”发展顺风顺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认可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

“让自己不那么舒服就是我的舒适区”，韩寒自己总结说，“还是想选择正确的那条路”。

夏嘉祥：种下一片珊瑚海

夏嘉祥的第一次潜水是在深圳西涌，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深圳的海水能见度不高，水中的杂物随着洋流在他眼前来回飘荡，四周茫茫一片，一度让他产生了在空中飞行的感觉。潜到海底，发现珊瑚也是零零散散，也看不到几条鱼，整个海底就是一幅无精打采的感觉。

第二年夏嘉祥去印尼潜水，头一扎到海里，就看见清澈透明的海水中，在金色的阳光折射下，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珊瑚，人就像掉进了金鱼缸，团团鱼群围绕着你，毫不畏惧地打量着你。

“这才是海洋应有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呐喊。

这种巨大的生态落差冲击下，2009年起，夏嘉祥开始参与深圳的珊瑚礁普查。深圳东部的大鹏新区地处东南亚近海珊瑚礁群黄金区域边缘，曾是珊瑚的天堂，但是最近30年间，大鹏半岛珊瑚礁在海底的覆盖率从原来的76%锐减到20%左右。眼看着大鹏新区的珊瑚礁年年变少，捡到的珊瑚断枝越来越多夏嘉祥觉得他需要做点什么的。

2012年，夏嘉祥加入了中国第一家珊瑚保护组织“潜爱大鹏”，开始探索珊瑚礁保护的方法。他们希望经过培训后，让更多的潜水员参与救助海底的珊瑚断枝，给它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种珊瑚”。潜水员会首先在拣选碎落在海底的珊瑚残枝，移到苗圃暂养，到珊瑚残枝恢复生机后回播到合适的位置进行固定，让它们慢慢地恢复过来。

听起来并不复杂的流程其实处处都是困难。

曾经夏嘉祥和他的团队直接把珊瑚种在水底的铁架子上，结果台风过后，珊瑚被刮跑了，铁架子也被掀翻了。历经不断地试验，他们终于用PPR支架做成了适应深圳海域状况的苗圃，把救助的珊瑚固定在上面，等它们恢复生机了，再回播到海底。

几年下来，夏嘉祥和团队一共在近30个人工礁上种下5800多株珊瑚，并设置了一条长达百米的珊瑚样带，长期进行观测记录。

但他也坦言，种下的珊瑚数量和成长速度都非常有限，赶不上人类破坏的速度。想要恢复大鹏的珊瑚礁，单靠自己机构种是不够的，更需要结合大鹏本地沿海的社区参与进来，更大范围地给珊瑚创造自然恢复的条件。



海底观测纪录

2018年,他们在溪涌社区支持下,在大鹏半岛最西端的“万科十七英里”海域范围内,勘测了海底的珊瑚礁生长状况,“十七英里”的业主委员会闻讯,专程登门,邀请潜爱一起将周围海域的珊瑚保护起来。

2019年,他们和中广核集团取得了联系,在位于大鹏半岛东端的大亚湾核电站海底,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记录,并编织成了图集,引起了中广核的重视。2020年,他们和中广核携手,一起在核电站海域珊瑚礁最密集的区域共同建设了全国第一个核电站范围内的珊瑚保育区,同时建立规章制度,禁止任何船只进入这个范围,为珊瑚的自然恢复,营造了一个最为自然的条件。

但这在夏嘉祥看来,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说:“种珊瑚的同时,更要种人心,改变大家对待海洋一味索取的态度,才是珊瑚保育的根本。”2015年开始,夏嘉祥和团队聘请海洋学科专家和自然课程编辑导师,以深圳大鹏半岛渔村世代相传的海洋智慧为母本,开发了“潜爱课堂”,把海洋生态认知课程带进学校,以游戏解构、传递海洋知识,并且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大鹏新区全部中小学校的覆盖。

更加深入的版本就是“**潮间带课程**”。潮间带是沙滩下与海水相接布满礁石的地方,潮汐在这里潮涨潮落,为部分海洋生物提供绝佳的生存环境。跟着“潜爱大鹏”的导师,孩子们会看到背着贝壳快速行走的寄居蟹,一被发现就躲进壳里,等安全了又鬼鬼祟祟钻出来,背着壳逃之夭夭。各种贝类纹丝不动地吸附在礁石上,长相奇特的石鳖怎么推都稳如泰山地吸附在礁石上。海参缓慢蠕动,海葵像朵绽放的小花,伸长了触手,在潮池里摇曳……通过眼睛和双手建立起的对海洋的认识,更能够转化为未来切实的行动。

大鹏半岛是深圳的后花园，节假日蜂拥而来的游客，对海洋形成了巨大的生态压力，游客们的一举一动，同时也影响着珊瑚的恢复状况。为了更大范围地激发游客、酒店、社会和政府关注深圳岌岌可危的珊瑚礁，“潜爱大鹏”在志愿者里组织专业的纪录片拍摄人才，组队拍摄了反应国内外珊瑚礁生态保护的纪录片《寻找珊瑚海》登上了腾讯视频热搜榜，并获得了2020年“福特汽车环保奖”野生动植物保护纪录片优秀奖。同时，中国国际纪录片节也发来了参赛邀请。2020年4月，“潜爱大鹏”拍到了深圳历史上首次海底珊瑚产卵的视频，在深圳地铁全线的月台和车厢内热播，被全国所有媒体进行了报道，登上了微博热搜榜，为深圳这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做了一次最佳的海洋生态和珊瑚保育的最好推广，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对珊瑚礁问题的重视，2020年，“潜爱大鹏”被深圳市关爱行动评为“深圳十佳公益组织”

访谈每一个公益机构的创始人的时候，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难吗？得到的回复通常都是：特别难。“潜爱大鹏”的项目倡导类和教育类居多，成本基本都集中在人力费用上面，成熟的机构创始人到后期主要业务基本可能就是找钱：找房租、找工资、找奖金、找场地费、找志愿者补助。所以聊起“福特汽车环保奖”的非限定性资助，夏嘉祥说“用在了最想用的地方”，除开必要的日常行政开支与薪水的发放，还支持了核心志愿者的赋能。

从2010年开始，夏嘉祥参与珊瑚保育已逾十年。很多写公益人的文章喜欢将大家塑造成秉持着理想信念一往无前的斗士，但其实大家时常都面临选择、犹豫和权衡，全职做公益的人往往需要家人经济和精神上更多的支持。今年疫情期间，家庭里最坚定的支持者太太突发心梗，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所幸手术及时，抢救了过来。但是否还能在珊瑚保育之路上持续下去，放在了夏嘉祥面前。前行是热爱，后退是责任，选择哪个都无可厚非。联系夏嘉翔做访谈的时候，他正带着太太在外面旅行，从9月份开始，他已经卸下了“潜爱大鹏”秘书长的职务，准备整理整理，和太太一起为社会做点不一样的选择。

感谢他的坚持，祝他的未来乘风破浪，找到属于自己的珊瑚海。

刘永龙：多希望海洋垃圾 变成一个讨喜的议题

有条件的朋友去海边玩的时候，基本都会订比较高级的酒店，倒也不光是为了服务和美食，更是为了酒店自己圈出来的那一块沙滩。洁白、细软，翻一翻能看到贝壳、小螃蟹，在水里走一走，要小心不要被悬浮的透明水母蛰到，非常符合正常人对海边的预期。

但是超出那一片小心维护的海滩,到别的海滩,到浅海,到深海,就是完全不同的图景。那里有塑料袋、有塑料水瓶、有塑料餐盒、有运动鞋、皮鞋、酒店的一次性拖鞋、有绳子、衣服、烟头和橡胶轮胎。

北太平洋亚热带环流东部就存在着一个著名的“大太平洋垃圾带”,有4.5-12.9万吨塑料漂浮在16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而这样的垃圾聚集区在各大洋共有5个。聚焦到国内,每年我国产生的6600万吨的塑料垃圾中,有800多万焚烧了,有1650万填埋了,剩下的62%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是没有收集,没有清运,那可能就在河里、湖里、山里。

2007年开始,刘永龙就和志愿者一起清理海滩上的垃圾,五年时间,他们捡了几十吨奇形怪状的垃圾,参加过净滩的志愿者常常会惊讶地说:“不来捡一次垃圾,都不知道能捡到啥。”他们年年捡,垃圾年年有,终于到2012年,“仁渡”机构转型聚焦海洋保护,“仁渡海洋”成为国内第一个专注国内海洋垃圾治理的非政府组织。

决定进入海洋垃圾领域之后,刘永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议题的扫描,我们国家海滩上有多少垃圾,分布在哪里,有什么类别。

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有多少垃圾最终去向不明,又有多少入海,不论公众行动,还是政府制定政策,均缺少基本的科学依据。为此,建立一个失控垃圾的数据调查和收集网络,是应对海洋垃圾问题的基本工作。2014年以来,“仁渡海洋”逐步组建了沿海岸线科学布点、定期定点抽样调查海洋垃圾的网络,并且连续五年发布海岸线监测的报告。全国90多个监测点的联动,让我们知道我国海岸线平均每一米就有一件垃圾,近80%都是塑料类。按照品牌来分的话,酒水饮料的包装瓶要占到近一半,接着就是零食食品的包装袋。2018年,“仁渡海洋”在“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支持下举办了第一次海洋垃圾监测报告发布会,邀请企业参与海洋垃圾品牌榜的发布。

净滩当然也还在延续,并且越做越大。2020年的ICC国际海滩清洁活动还没结束,但是“仁渡海洋”已经联合伙伴举行了169场活动,覆盖全国17个省级行政单位的46座城市10670名志愿者参与了净滩行动,累计清理海岸线&河道77.3千米,以及48.36吨的海洋垃圾&河流垃圾。

有人会问:“捡垃圾是捡不完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净滩的意义在哪里?”

垃圾虽然捡不完,但是海滩上的垃圾如果不去处理,只会越来越多,目前的阶段除了发动志愿者到海滩上去,人工收集、分拣、处理垃圾,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垃圾的切实途径。更重要的是,“看见”这个行为本身具有直观的影响力。说起这个刘永龙其实有点无奈,垃圾议题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让人不太愉快的议题,海滩上成片的垃圾很容易引起观

感的不适,但这样的不适其实具有很大的力量。失控垃圾的终极责任人是个人,当把城市中生活的人带到海边,直面生活中每一个消费行为的成果,反而更容易向上溯源、生出自我改变的意向,这是最直接的行动策略。



仁渡海洋Timberland & Vans净滩活动

除了组织企业和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净滩,2015年开始,刘永龙希望探索面向亲子家庭的净滩活动“蓝色小侦探”,以更深入地体验传递观念的同时,更是希望可以实现机构的自我造血。“最开始试水的时候就碰壁了”,刘永龙很坦诚地说,“按照成本核算下来,单次活动需要20个家庭参与,每人至少交170元才能回本。但垃圾议题毕竟不像海洋生态教育,它直观是一个‘不美’的话题,愿意为这个买单的亲子家庭很有限”。曾经也有妈妈团来联络刘永龙,希望合作“蓝色小侦探”的项目,但是并不愿意支付公益机构的人力成本。后来刘永龙调整了策略,家长只象征性地交50元报名费,其余的成本都由“仁渡海洋”筹款来解决。“公众很难理解全职公益人需要发工资这件事情,在大家达成共识之前,很需要像‘福特汽车环保奖’这样专业的资助来覆盖背后的成本。”

46岁的刘永龙今年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聊起来全职做公益这件事,他开玩笑说:“后悔,非常后悔,不然我的头发不至于白成这样”。2007年兼职做“仁渡海洋”的时候只是小打小闹,直到2013年刘永龙全职管理“仁渡海洋”之后,机构才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件事情就发展到了那个阶段,让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不然就继续不下去了”,刘永龙对于选择这条路的原因很坦诚,“其实选择时时刻刻都存在,当面临挫折的时候可能心理落差会更大一点,毕竟我们走的是一条虽然不会错,但是注定很难的路。”

“那考虑退休么?”

“哈哈,再说吧。”

有人会觉得海洋议题只有住在海边的人才会感兴趣,但其实只有夏嘉祥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韩寒是移民到海南的湘妹子,刘永龙是地地道道的宁夏人。内陆人对海洋有多期待,看到不再蔚蓝的海洋就有多失望,投入海洋保护就有多忘情。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在可持续渔业、珊瑚恢复、海洋垃圾领域一直深耕,终于重塑了一些些蔚蓝,而更广阔的蓝色海洋,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努力寻找。

你来吗?

获奖故事

- 韩寒,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带领团队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2019年年度先锋奖。
- 夏嘉祥建立的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是2018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大奖的得主。
- 刘永龙是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曾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2013年传播奖三等奖(“爱我生命之源”海滩清洁项目)和2017年年度先锋奖。

温和地重建绿色

——方应君、璇芷、周翔

做污染监督和防治的环保公益人经常自嘲，自己是所有环境议题中公众人缘最差的那个，这个体验有个直观的例证，就是历来面向公众募款的污染防治项目总是收入不佳或捐赠排名垫底。或许是污染问题给人的联想是黑臭的水体，刺鼻的灰烟，灼烧的鼻腔和喉咙，人们总是趋利避害，选择性地避开让人不适的话题。

但是只要碰到一个污染问题的受害者，就很难再无动于衷。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靠着土地吃饭的农民不想离开家乡，用尽一生积蓄买下新房的家庭不愿意搬家，而当他们周围发生污染问题时，不论是水、土地还是空气，常常感觉求告无门，大多最终落得“移民”收场。

总要有人做点什么。

方应君：污染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在大众的眼里，污染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但其实“与我无关”的话题。除了城市雾霾这种避无可避的问题，大部分严重的污染事件受害者多是乡村居民，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已经为生活支付了足够成本，应该不会需要面临污染问题。

但是其实，城市中产一样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2007年是方应君人生的分水岭。07年之前他是企业高管，收入不菲家庭和睦，07年之后他却成为了一个疲于维权的污染受害者。2007年1月，方应君一家搬进位于苏州的新房，起初一切都很好，新建的小区公共设施齐全，绿化也做得不错。然而，4个月后，整个小区都开始弥漫着一股“来路不明的味道”。方应君说：“这个气味最浓烈的时候，小区里的所有人都会感到咽喉发痒、呼吸困难，当时我的儿子才几个月大，他经常在半夜被呛醒，我与邻居交谈后发现大家的感受都是相似的。”



绿色江南调研现场

业主开始每天晚上驾车寻找怪味的源头,半个月后,他们找到了一家味道相同的企业。最开始他联合业主向有关部门举报,得到的回复却是“该企业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指标达标,未超过工业排放标准”。方应君并不相信,咨询过专家之后确定,既然这么多业主在闻到气味后都产生身体不适,那么这家企业的排放肯定是有问题的。方应君接着开始举报、投诉、谈判、请求信息公开的漫漫征途,一同维权的业主慢慢搬离,方应君后来也辞去了工作。

2012年末,相关部门责令涉及污染企业的车间搬迁,周边的小区环境终于恢复了正常,但方应君的人生轨迹却回不去了。“这几年我看到太多人被迫放弃,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受害人在苦苦挣扎,我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

2011年方应君成立了“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之后的九年,“绿色江南”只做了一件事:工业污染源监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九年会是维权斗士智斗污染企业的抗争史,但真实情况其实是理性而温和的。扎实的调查成果与媒体传播能力赋予了“绿色江南”显著的影响力,2017年12月,“绿色江南”发布《全国最大铅酸蓄电池出口商涉嫌偷排含铅废水——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污染调研报告》,微信阅读量10万+次,澎湃新闻对此进行报道,阅读量达39万次。文章发布第二天金湖县环保局就联络到了“绿色江南”,第三天理士电池也取得了联系,三方进行了多次磋商,最终理士电池投入巨资进行了整改。

传播能力又反过来增加了他们的话语权,让他们可以坐下来和企业协商,“我们是消灭污染,并不是消灭污染企业,新闻曝光是最后一步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更希望和政府、企业建立良性互动,在前期就把问题解决掉。”方应君和他的团队每年曝光的案例

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污染事件都已经通过“撰写调研报告递交至环保部门——开展多方圆桌会议——实现环境污染治理”这个流程获得了解决。

现在的大好局面并不是一蹴而就,机构发展最初不是没有面临与企业的对抗和来自政府的压力,2016年前后,方应君重新梳理了机构的战略方向,更加坚定地推行温和、理性的污染监督方式,当年“福特汽车环保奖”提供的15万元资金正好用来招募新的专业伙伴。而当2018年机构提出多元发展的概念后,“绿色江南”第二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奖金正好协助实现了新战略的实施。“‘福特汽车环保奖’给了获奖机构充分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把奖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对“绿色江南”来说就是这两次关键的转型,让我们可以在当地的污染防治领域继续深耕。”

璇芷：一路向上溯源

邓梦璇行走江湖用的名字是璇芷,“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芷,但她本人看起来倒是利落果决得多。

进入环保行业看似偶然实则必然。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璇芷进入福建新闻台,开始跑一线新闻报道,当时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却也是污染频发,缺乏监管的严重时期。璇芷见了太多求告无门的受害者,他们多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眼看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土地被污染祸害,村里人生病去世,想要抗争但苦于没有资源又不懂法律,只能上访、下跪、给电视台打电话、在污染企业门口拉横幅。人微言轻,实在收效甚微。璇芷太想帮助他们,但是堆积如山的线索需要核实调查,成文报道也要经过筛选排期,即使成功上了电视,一次两次的新闻报道始终治标不治本,太多污染企业对新闻曝光熟视无睹,即使接到警告白天停工,晚上继续偷排废水废气的也比比皆是。

还是要想点别的办法。

2008年离开电视台后,璇芷正式加入了福建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开始推进“绿乡村”计划。与其满世界筹措资源帮助受害者,不如赋能村民自己守护家园。

第一个试点落在于福建母亲河闽江入海口的马尾长安村,工厂持续发生生物柴油污染事故,致使闽江长安村江面段油污遍布,河里的水草、生物死亡,工厂排出的气体恶臭延绵3公里外,一年12个月当地人有8个月无法开窗。璇芷和她的团队开始每周到村头给村民培训,告诉大家怎么进行环境监测,怎样保留污染证据,之后如何向当地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怎样进行污染举报,怎样进行环境诉讼。

2009年,长安村的污染企业陆续停产搬离,周边的村镇纷纷效仿“绿乡村”的做法。后期“绿乡村”项目不断迭代,最终在2016年,璇芷代表绿家园领取了当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先锋奖一等奖,评审评价璇芷和她的团队“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把环境维权力量培育成环境守护力量”。

与此同时,转变也在悄悄发生。“绿乡村”做了近十年,覆盖的地域越来越多,受益人也越来越多,但总是在污染问题的结果端打转,璇芷还是希望向上溯源,从头避免污染问题的产生。和所有环境问题一样,污染问题原因复杂牵涉主体多,当她把利益相关方层层扒拉开就发现,能够深入的蓝海并不很多。公众、市场和政府是三个最重要的主体,公众的层面“绿乡村”已经做了十年,政府层面的政策倡导也有很多机构在做,市场里面通过供应链倒逼企业关注供应商环境成本的路径也已经有人在探索,而从事污染监督、举报、披露的伙伴早已遍地开花。

还缺什么呢?

是了,还缺资本,还缺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牵制。2007年中国就推出了“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然而近十年间,绿色信贷还停留在纸面上,金融机构一方面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即使愿意衡量企业的环境绩效,也会发现数据既难获得,又不好用。直到2015年前后,相关政策和立法强势落地,璇芷觉得,机会来了。

她带着“绿行者”(全称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以下简称“绿行者”)“从福建“绿家园”独立出来,专注于推进绿色信贷的落地。经过几年的打磨与摸索,“绿行者”终于在2017年推出了“**环境和社会风险识别公共查询平台**”。“绿行者”通过对环境数据进行收集、加工与分析,对企业的环境风险程度进行了五级划分:绿色、白色、黄色、红色和黑色,绿色最优,黑色最差,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可以获取直观、高效的企业环境风险评估。

从2014年开始,“绿行者”就在和中国唯一一家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兴业银行进行深度合作,分享企业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风险管理部门和风险预警部门会从璇芷团队提供的数据和报告中抽取有用的信息,嵌入到核心系统中,具体的业务人员如果要做信贷就会看到,就会要求企业整改之后再做贷款。璇芷也因此惹上一点小麻烦,曾经有企业因为贷不到款,法人带着办公室主任闯进“绿家园”,坐下不走并扬言要跳楼。

“最后当然是没有跳”璇芷笑,“这些极端的冲突性个例已经很少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企业野蛮生长的时代了,在一个地方开个厂子他是希望长久的发展下去的,现在基层环保部门的监管和十年以前完全不是一个力度,企业也不希望总是因为环境问题吃罚

单,我们的评估就是提前把他们面临的风险直观地展示出来。而且我们不光说他们哪里做的不好,我们还告诉他们怎么改,这其实是互利共赢的事情。”

2019年冬天,璇芷又一次站在了“福特汽车环保奖”的领奖台上,这一次是代表“绿行者”领奖。这一笔奖金原本要支持她在今年搞一件大事,联合更多金融机构加入绿色信贷的行列,但是疫情的缘故只能转轻量化推进。

“不能告诉你有谁,但是有很厉害的大机构”,璇芷神秘秘的,但也充满了信心。

周翔：“绿满江淮”有两只手

“福特汽车环保奖”20年来,获奖三次以上的机构不太多,杨欣的“绿色江河”算一个,周翔创立的“绿满江淮”也算一个。

2004年第一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时候,“绿满江淮”刚刚成立一年,周翔自己也还是个大学生的,当时的想法也比较简单,就是想把安徽的大学生环保社团都拧到一起,一同关注淮河的水污染问题。一群大学生志愿者一起相互培训、赋能,找钱提供小额资助,一起去淮河调研,现在听起来小打小闹,但在十几年前的安徽却是首创。周翔用“福特汽车环保奖”的5000元奖金租了一间办公室,“忽悠”了志愿者来上班,“绿满江淮”就这样有模有样地运营起来了。

2006年,“绿满江淮”的一队志愿者来到蚌埠,他们发现了与化工厂零距离接触的仇岗村。2004年,占地107亩的九采罗化工厂(以下简称九采罗)在仇岗村落户,位置就选在村子的中心地带,隔着



“绿满江淮”进行污染调研

一道院墙就是村民的家。工厂释放的浓烟随风飘荡,刺鼻难闻,村民只能关紧门窗,憋在屋里。未经任何处理,化工厂的废水被直接排了出来,顺着村子里窄窄的鲍家沟流向淮河,一道黑色透迤数公里。污水长年下渗,即便打井数百米,舀出来的依然“半碗是水,半碗是药。”村里突发癌症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至2006年三年时间,就有50多人死于癌症,癌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张功利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化工厂的村民。交涉未果后，张功利开始和九采罗打官司。在法庭上，化工厂先是亮出先进企业的名牌，接着又拿出无污染企业的证书，人家还是市里的纳税大户，让这官司没法再打。他无奈地变成“讼棍”，诉讼无门又接连上访，但总是势单力薄，呼声微弱。

“绿满江淮”是他的第一个助力。

周翔和他的团队希望温和、理性地推动问题的解决，他们鼓励张功利拍摄化工厂污染照片保留证据、动员全村村民绕过企业直接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打电话申请信息公开。此外，他们聚合了大量媒体的力量，并且通过制造热点事件创造新闻价值，当40多个小学生同时向环保局写信要求解决污染问题时，相应的关注与资源涌入了仇岗的维权事件。

2008年12月20日，三家化工厂停产并搬离仇岗村。2009年开始，“绿满江淮”和美国导演杨紫焯(Ruby Yang)共同拍摄了淮河纪录片“仇岗卫士”，其中将仇岗村案例作为典型故事叙述。201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奖，成为唯一获奖的中国影片。仇岗的成功案例也直接促成了“绿满江淮”第二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6万块的奖金加上1万块的“私房钱”，周翔搞了一辆面包车，这辆“中国神车”自此带着他们跑危险废物的污染现场做调研采数据、跑污染企业开展危险废物管理培训、跑法院推进危废公益诉讼，见证了绿满江淮近十年在污染防治领域的深耕。

2016年，周翔在北大就读社会公益管理硕士时结识了桃花源基金会的负责人，桃花源的公益保护地正在如火如荼的铺开，周翔也希望扩展机构大的影响力，双方一拍即合，2017年年底，黄山市黄山区政府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正式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以九龙峰省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建立公益保护地，委托给桃花源基金会管理50年，在地执行保护工作则由“绿满江淮”全面执行。这一年，“绿满江淮”正巧又得了一次“福特汽车环保奖”，15万元的奖金协助启动了九龙峰的项目。

九龙峰保护地的核心保护工作由8名专职巡护员和周边村庄的社区巡护队共同完成。他们定期上山巡查是否有盗猎野生动物的情况，清除陷阱和兽套，部分巡护员考取了协警编制，发现盗猎者可以控制住扭送公安机关，再进行后续处罚。保护区内还架设了35台生物多样性红外触发检测仪(红外相机)，已经拍摄到了黑麂、白颈长尾雉、黄山短尾猴、黄喉貂、黄麂等十几种野生动物。

为了弥合生态保护和当地社区生计之前的矛盾，周翔和他的团队推动开发了自然教育课程，并且和安徽自然教育机构、研学机构签订了协议，一年能接待1300到1500人

次的游客。来了的孩子吃住都在周边老乡开发的民宿家里,最开始周翔团队只邀请了11户人家在自家二层设置民宿,一年下来比正常务农增加了50%的收入,第二年村里有人盖房,都会特意将二层盖成有独立卫生间的标准间。周翔还希望可以推进更多社会企业的成立,实现保护地的自我造血,未来不再单纯依赖基金会大的捐赠。

20年,能做的事情可太多了。

左手是污染防治,右手是公益保护地,周翔的人生现在要朝着两个方向前进。他曾经说大学毕业后去国际机构工作主要是因为当时要赚钱生活和学习NGO的运作经验,但是几年下来对物种保护也有了很深的感情,正是这份感情在十年之后把他带到了九龙峰。看似不同的选择归根结底都是对环境的初心,而这其实也是“福特汽车环保奖”20年的初心,更是大家同行二十年的原因。

“福特汽车环保奖”在华20年,也是中国的环境问题逐渐改善,监管逐渐完善的二十年。污染防治领域的伙伴从最开始的协助受害者维权出发,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方应君和“绿色江南”建立了多方共识的监督体系;周翔和“绿满江淮”从危废污染出发,开辟了物种保护的新方向;璇芷和“绿行者”向上溯源,和金融机构联手推进资本向绿。冲突最终化为合作,激烈呐喊最终成为温和理性的共赢,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难见到求告无门的村民,再难见到被废水废气逼走的住户。

20年的努力,幸不负光阴。

获奖故事

- 方应君和他的绿色江南是“福特汽车环保奖”2016年先锋奖三等奖(“沟通促合作,同保护太湖”项目)和2018年年度先锋奖的获奖者。
- 璇芷,本名邓梦璇,曾和团队获得过“福特汽车环保奖”2016年先锋奖一等奖(福建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的“绿色乡村计划”)和2019年年度先锋奖(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
- 周翔和他的绿满江淮是“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老朋友了,他们共获得过四次“福特汽车环保奖”的相关奖项,具体分别为:2004年大学生项目奖(安徽绿满江淮一期项目)、2011年先锋奖三等奖(淮河保护交流项目)、2014年先锋奖三等奖(环境法律在地行动项目)和2017年年度先锋奖。

影像,带来希望 ——野生动物摄影师徐健

聊起野生动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赵忠祥老师的声音:“在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雄狮正在觅食……”央视的《动物世界》是很多人的自然启蒙,去东非观看角马迁徙可能是很多人一生必做的一百件事之一。

但其实作为中国人,我们大可不必舍近求远。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位列北半球第一。我们最北有温带森林,最南有热带雨林。我们有47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的海洋,还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区。丰富的环境里孕育了一些最特别的生命,比如大熊猫、藏羚羊、滇金丝猴。

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而比这更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独有的物种在被人了解之前,就已经灭绝了。

不过别担心,已经有人走在用影像抢救濒危物种这条路上。

徐健:希望自然摄影师可以 靠影像养活自己

徐健进入影像保护这个行业,其实和奚志农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1998年奚老师搞了一个活动叫“北京国际自然电影周”,从小看《动物世界》长大,甚至因此去学生物的徐健,报名去现场做了一个看门的志愿者。在那里徐健第一次看到BBC拍摄的新鲜纪录片在大银幕上播放,他深深地被自然影像的魅力所吸引,并决定投身其中。

2000年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01年跟着奚老师深入云南拍摄滇金丝猴,2003年和奚老师一起筹备成立野性中国工作室,徐健慢慢成为了专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也慢慢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局限。“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位列

北半球第一。它不仅拥有从寒带到热带的完整的自然区系，还有从海洋到平原再到高原的地理环境。虽然生物多样性丰富，可是许多动植物，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要想拍出中国的《动物世界》，需要职业的自然摄影师团队，但是这个职业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中国还不存在。“野性中国”聚集了一批中国最好的自然摄影师，但是再厉害的人都只把摄影当成副业，是个爱好，能靠自然摄影作品养活自己的，几乎没有。

2008年，徐健创办了“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所”(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 简称IBE)，通过将自然摄影和生物调查结合起来，为自然保护区提供专业影像服务。徐健和他的伙伴先后深入梅里雪山、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三江源等地区，对中国50个地区开展了近百次野外调查，记录了6000多种野生生物。但这只是徐健“野心”的第一步。他希望自然影像工作能够获得市场认可，让摄影团队有合理的收入，可以自我造血。2013年IBE获得的“福特汽车环保奖”传播奖一等奖的20万元奖金，全部注入了机构的运行和项目的拍摄，但IBE的市场化尝试还是走得很艰难。



拍摄中徐健

2018年，徐健开始他的“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缤纷自然”，开始尝试中国国产自然纪录片的商业化探索。毫无疑问，纪录片的制作难度更高，对创作、管理、运营的要求更高。这一次，徐健不仅是摄影师，更是制片团队的带头人之一。三年磨三剑，“缤纷自然”完成了《寻找最后的穿山甲》、《天行情歌》、《方舟·东黑冠长臂猿》三部纪录片，这三部作品都获得了2020年“福特汽车环保奖”野生动植物纪录片评选计划的奖项，而对于后续的推广传播，徐健有更多的想法。

“以前我们拍片子的时候都在讨论要拍4k还是8K,而这两年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拍竖屏,我们要考虑更广泛的传播途径。”徐健说。除了送作品参加“福特汽车环保奖”等环保领域的评选,他们还在各种影视节展中亮相,还找到在年轻人中人气颇高的配音演员进行演绎,在B站进行发行。

“我们会继续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希望能找到中国人最喜欢的自然纪录片讲述方式”,谈及缤纷自然的未来,徐健有很多想法和期许,“中国还有太多独特的野生生物、美好的自然环境、感人的保护故事没有被记录和讲述,我们真心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更多的人加入到记录和保护自然的行动中,让中国的自然故事更加为人民大众了解,让中国的自然故事走向世界。”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把中国搞自然影像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会发现自己和奚老师多少都有点交集。奚志农像一面旗帜,聚集了忧心自然的摄影师,把自然的精妙捧到公众面前。著名的生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博士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要有了解,才会有关心;有关心,才会有行动;行动,生命才有希望。

有更多的“徐健”,更多的自然摄影师,中国的物种,有无限可能。

获奖故事

- 徐健,“影像生物调查研究所”(IBE)和“缤纷自然”创始人,IBE曾获得2013年“福特汽车环保奖”传播奖一等奖(“中国西部边远地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缤纷自然(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曾获得2020年“福特汽车环保奖”野生动植物纪录片评选计划的奖项。

我们依旧珍惜 这些真实的链接

——“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审 张立、李瑞农

“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一直都很神秘，外界都知道这样一个由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手握“生杀”大权，决定谁入围、决定谁获奖，但从来在公开渠道上看不到他们，也有人因此揶揄说这个项目不够透明，评审怕是能力不足而羞于见人。为什么这样低调，要这样藏着掖着，主办方说出于保护评审的目的，评审老师则说我们这些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获奖人一定要能代表环保公益的最高水平。一晃20年过去了，有些评审已经从这里再次“退休”，有些评审已经“超期服役”，更有两位评审从而立之年开始参与，一直做到知命之年，社会角色可能越来越多，但“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审却像底色一样长久稳定存在。

张立

其实，评审委员会的阵容一直都很强大，既有来自政府部门退休的高阶官员，来自学院的知名环境教授，也有来自行动一线的实务专家，根据不同阶段关注的议题还增补具有特别专业背景的评审，同时人数一直保持是奇数。但很少有评审能像张立老师一样做到既是最老，又是最年轻。每次说到这一点，他就一边拍肚子，一边捋头发，笑言都是岁月的沉淀啊。

张立老师加入“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团队时，是所有老师里最年轻的。作为初代评审的家属参与了两次评审工作之后，他在2002年自己上阵做了评审工作，一做就是十八年，到现在反而成了资格最老的评审。

但他带来的一直都是年轻的锐气和一线的实践。

不管是作为大学教授,他因为研究亚洲象保护,还是后来担任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首代、保护国际的中国项目主任,张立老师有很多时间都扎根在一线的物种保护工作里,所以评审老师有时争执不下的时候,问一下张老师总是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2013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在终审讨论时,评审对于先锋奖大奖要不要给独立巡护老君山滇金丝猴30年的张志明争执不下。毕竟距离“福特汽车环保奖”进入中国已经过去十几年,早年间像张志明这样的个人英雄奖励了不少,评委会更想通过奖项引领草根环保力量向组织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三十几年的巡护实在艰苦,老君山的滇金丝猴保护成果也有目共睹。大家自然而然地问到了张立这个多次进入滇金丝猴栖息地,对云南的保护工作比较熟悉的人。“这个地儿我去过,确实非常不容易,大奖应该的。”争执画上了句号。



张立参与“福特汽车环保奖”
评审会议

据说长期研究一类动物久了,这个人也会长得像这类动物了。因此看着张立老师走路一摇一晃和“老成持重”的身材,很多人在得知他研究大象以后都连称好像好像。但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大象教授”上了高原竟然变朋克青年。2015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邀请张立老师代表评委会,回访三江源方向的获奖机构。去过的人都知道高原盘旋的山路有多恐怖,道路狭窄路面坎坷,老司机开起来也要精神集中,坐车的人也颠得不成形,面如菜色。结果,张立老师自告奋勇去做司机,大家惊奇地发现他的驾驶水平相当了得,路上遇到大坑,车队有车陷进去的时候,他还能把别人拉出来。

在对获奖机构“绿色江河”的回访中,张立老师基于多年对于亚洲象保护的研究,从非常实用、专业的角度给“绿色江河”开展的雪豹保护提出建议,监测和调查可以怎样展开、数据如何利用、怎样利用数据做出雪豹最适栖息地的地理图片、科学研究怎样提升到政策建议的水平等等角度,露了一小手,就让同行的媒体记者觉得评审果然厉害。

2016年张立老师加入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担任秘书长,从讲台、国际组织到了国内环保公益的支持平台,他对环保公益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基层NGO发展有了更丰富的信息,让他在评审会议中常被要求说更多,而有时又不能发声。2017年“福特汽车环保奖”转型做组织资助后,评审的工作压力明显加大。评委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项目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成效大小,而是一个环保组织的过去与未来,组织的业务、团队与战略是否吻合清晰、具有竞争力,一个环保组织在某个环境议题上是否有独特的生态位、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推动该议题发展是否有关键作用,是不是能代表这个领域内当年国内草根环保组织的最高水平,都需要去多方面把控。这时其他评审都让张立老师先分享一下,阿拉善SEE基金会对一些组织所作的资助经验,而组委会又要求张立老师注意避嫌,不能拉票,如果跟一些机构过从过密,如担任顾问、导师等,就不能再打分,这个度的拿捏分外费神,所以张立老师有次跟组委会傲娇地说越来越难做了,我申请“退休”。其实谁都知道,他才不会真“退休”。

当谈到做“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18年、入行环保20多年的体验,张立老师说感觉就是“痛并快乐着”。痛是在于每年的评审都会发现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更多环境问题亟待改善,但快乐在于总是能发现更多的草根力量在进行深耕和创新地尝试。

李瑞农

在2003年担任“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审之前,李瑞农老师已经在环境报道的领域做了十几年了,报道树立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五百佳”安徽小张庄的典型,揭露过山西土焦污染、淮河污染等环境事件,他也见过太多初代民间环保人物和环保英雄曲折和跌跌撞撞地尝试,曾组织过“地球奖”鼓励支持这些最早为环境代言的人。后来,李瑞农老师成为《中国环境报》社长,把对环保人的关注带到“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中,而作为媒体人,他对如何发挥奖项影响力、如何扩大环保公益的影响力有着独特地洞察。

最初的“福特汽车环保奖”有一点点像环保界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在人民大会堂对草根英雄进行表彰,慢慢评审老师觉得,光是颁奖并不够,一线环保人的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福特汽车环保奖”需要在社区、政府、群众关系处理及具体的利益博弈中做点什么。李瑞农老师特别提到2003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百年特别奖的商氏家族,那一年他第一次参与评审,对商鹤羽父子几十年保护苍鹭印象深刻。虽然河北千鹤山的苍鹭群经由这对父子的努力,从1968年的8只发展到了2003年的2000多只,形成了当地独特的生物链,每年还吸引了大量白天鹅、黑鹳和金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来到当地休养生息。但坚持护鸟势必会和打猎为生的居民,或者亟待开发苍鹭栖息地的当地

政府产生摩擦，商氏父子一度与当地各个利益相关方闹得很不愉快。为此，在李瑞农等专家老师的建议和协助下，“福特汽车环保奖”当年颁奖的时候，特地请了承德市的副市长到场，在主流媒体的注视下为商氏父子颁奖，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增加了当地的荣誉感、责任感，强化了保护鸟类及其栖息地意义及责任认识，加深了理解和支持。

如果说张立老师总是能带来一线的经验，李瑞农老师则是“福特汽车环保奖”在政策方向方面的长期智囊。“福特汽车环保奖”每年3月都会做评审会议，主办方、组委



李瑞农参与“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审会议

会与评审委员会的专家老师一起讨论当年的评选主题与方式，希望能做到“三结合”（结合热点、结合政策和环保发展趋势），这时除了外请一些专家来分享外，李瑞农老师的关于当前环境形势及政策分享几乎成了“保留节目”。

谈及为什么坚持做评审快20年，李瑞农老师很感慨：“我们做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宏大的议题或者是议题的一个切面，比如水污染、比如物种濒危，但是一年一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审给了我一个更加感性的视角，我会看到这些环境议题背后的努力者，他们怎样从一个人两个人变成一个组织，组织怎么逐步专业化、职业化，关键人物怎样不断成长、提升，怎样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民间环保和公众参与的建设性、有效性。很多的老朋友是我们一路相陪伴走过来的，这种长情的链接让我觉得特别真实，也让我有更多机会更直接、感性接触到社会和公众参与生态环保的生动事例和变化趋势。”

“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一直都很神秘，20年间悄然已从老中青三代更迭为中青两代，评审老师们有时聚在一起说：“这么多年400多个获奖的项目、机构和人，都没有出事，没让这个奖留下污点，这真的是值得庆幸啊。”语气就像在说自己教过学生都没有走歪的老师，既有语重心长，又有小确幸。其实“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获奖机构很多都成了行业标杆，或许正是有了这样一群真诚、务实、坚韧又可爱的评审老师，这里的故事才不仅激动人心，还分外温暖。

附录 1. “福特汽车环保奖” 历届发展历程

年份	特点
2000年	首次在中国举办“福特汽车环保奖”，由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了以长城、黄河和长江命名的奖项。获奖的六个项目展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各有千秋。申请人中有年近古稀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弱冠少年，有新闻战线的记者，也有偏远山区的农民。
2001年	增设青少年项目，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环保事业中来。以着眼未来的襟怀，播撒下了更多希望的火种。
2002年	随着“福特汽车环保奖”影响力的不断深入，首次收到超过400份申请表。当年，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近三十个项目获奖，使“福特汽车环保奖”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003年	正值福特百年华诞，“福特汽车环保奖”特别设立了百年特别奖——野生动物保护奖，突出了人类与环境相互依存，与动物是共生的朋友这一理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的春雷行动获得了特别贡献奖。
2004年	首次举行了区域性的推广活动，使这一奖项更加深入基层民间，并增加了大学生环境项目，鼓励当代大学生积极参与保护环境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5年	结合中国环境的现实问题，首次设立鲜明的主题：“保护水资源，共创和谐生活”，强调保护水资源和水生生物的重要意义以及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一创新不仅获得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也获得了群众的广泛参与。“福特汽车环保奖”荣获中国环境保护的最高荣誉——“中华环境奖”，并将5万元奖金投入下年的环保奖奖金中。
2006年	以“创新发展，人境和谐”为主题，“福特汽车环保奖”紧密结合中国政府可持续发展的国策及现实的环境状况，以环保NGO能力建设培训和青年发展论坛的形式帮助民间环保组织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年份	特点
2007年	以“绿色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特别增设了“社区环保小额资助项目”,鼓励与社区相关的环保创新方案。除了继续为地区民间环保组织举办能力建设培训外,为大学生环保社团提供资助,倡导和鼓励他们走进社区,开展环保知识宣讲和环保文艺交流。
2008年	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活动宗旨,以推进生态文明为核心,增设了生态文明贡献奖。
2009年	进入中国十周年,制作《艰·持——“福特汽车环保奖”中国故事》,通过与历届“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委召开圆桌会议,对10年中的部分获奖项目进行回访,认真回顾和总结了10年来的经验得失,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2010年	以“节能减排、低碳生活”为主题,扩大奖金金额到150万元,继续支持中国民间的环保个人与团体。
2011年	“福特汽车环保奖”以“共环保·感非凡”为主题,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首次设立了可以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Flash或视频创意奖项——“自然环境保护-宣传创意奖”。
2012年	以“加强生态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设立两大类共23个奖项,奖金总额计150万元人民币。同年5月,斥资25万美金(约合人民币158万元),与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牵手打造“绿色晋级”计划,在一年的时间内,对中国100家草根环保组织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福特汽车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先生亲临出席CEGC颁奖典礼现场。
2013年	以“践行生态文明”为年度主题。在“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自然环境保护-传播奖”这两大传统奖项的基础上,新增“社区参与创意奖”,新奖项的设置旨在鼓励那些致力于推动环保理念在社区的深入、倡导公众积极参与并帮助人们养成环境友好的行为方式、具有创新性的想法或计划,使社区为更美好的环境做出贡献。奖金总额提高到200万元。
2014年	首次在颁奖典礼上举办“绿色出行”环保论坛,引导各方参与环保的讨论。

年份	特点
2015年	以“联合行动,共同治理”为年度主题。为了真正体现鼓励优秀的环保项目落地社区,设置社区实践奖,代替社区创意奖。2015年7月27日-8月3日,“福特汽车环保奖”对2014年的获奖项目“长江源生态拯救行动”开展了为期6天的项目考察之旅。本次活动为“福特汽车环保奖”首次组织对获奖项目的中期评估考察。
2016年	以“推动公众参与,共享绿色未来”为年度主题,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和鼓励民间环保组织、企业、政府共同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列。 2016年,由“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合一绿学院等发起成立“环保资助者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数据库和经验分享,推动资方更有效率地支持民间环保力量和议题发展。
2017年	升级为资助“追求系统性变革、有突出贡献”的环保组织,为它们提供非限定资助,助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设立1名“年度大奖”和10名“年度先锋奖”。
2018年	以“推动多元共治,共促生态文明”为年度主题。2018年,“福特汽车环保奖”支持3家往届获奖组织举办议题类沙龙,促进环保最新议题的推广和讨论。
2019年	以“参与环境共治,共建美丽中国”为年度主题。2019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回访活动打破以往形式,通过各渠道进行公开招募,来自媒体、企业内部和公众等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26位人士参与本次回访。此次回访,“福特汽车环保奖”联动梨视频平台,制作了张志明和奚志农故事短片,发起“更美好的世界”全民拍客活动,对“福特汽车环保奖”的21个过往获奖机构进行回访记录。

附录 2. 评审专家名单

现任评审简介

张 立

2002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生态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研究所教授、中国动物学会副秘书长。现任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行为学和保护生物学。目前主要开展以亚洲象为代表的濒危物种的种群和行为生态学研究,通过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和有效管理,建设生态走廊,和打击偷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达到物种保护的目标。

李瑞农

2003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高级记者,“地球奖”获得者。现任中国环境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周 琪

2004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学名师,教育部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水污染治理重大科技专项,发表论文100多篇,获得1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高 天

2013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多年的环保志愿者。1999年与网友协同创建环保互联网社区“绿网”;曾供职香港乐施会支持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曾任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副秘书长;USDO社会组织自律吧行动联合发起人。曾任自然之友战略顾问。

胡小军

2014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生态学博士,曾任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智库中心主任,现任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广州市慈善会理事、深圳市慈善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杨百瑾

2016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曾任职于林业部科技司、办公厅及国家林业局办公室、驻云南森林资源监督办事处、林改司,正司级。曾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已退休。

李 伟

2019年成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曾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环保总局副处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已退休。

顾问简介

张坤民

2000-2014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清华、人大两校博士生导师及北大、武大、浙大等10所大学兼职教授,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专任教授等。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环境政策与管理、国际合作等。主笔或合著环保专著20册;翻译或审校相关书籍22册;发表论文或报告100余篇。

沈茂成

2006-2012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曾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林场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顾问。在国有林场建设与持续发展、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以及生态旅游方面,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吕淑萍

2000-2015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高级工程师、环境学专家。曾担任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党委书记、局长。多年来在科研岗位及政府领导岗位任职,并且负责和参与多个环境方向的科研项目。为上海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生态保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智勇

(2019年已故)

2000-2005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原林业部副部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林学会第七届理事长。

卸任评审简介

徐本亮

2014-2015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现任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重庆卓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浙江万礼公益服务中心主任、昆山卓越公益咨询中心主任。上海最早从事创业培训的资深创业指导专家,在创业教育和开业指导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社会认可度。

陈 键

2013年-2018年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评审。

现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经管院讲师,曾任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读博士。自2003年进入公益领域,专注社区公益数十年,先后在国际计划、微软社区事务部任职,从事教育、医疗、环保、企业社会责任等多领域的公益工作。